

第四集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四集

目 錄

今後同志應該怎樣努力

我們如何紀念國慶

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年紀念日演講詞

中央黨部第三十四次總理紀念週演講詞

中央黨部第三十七次總理紀念週演講詞

中央黨部第三十八次總理紀念週報告詞

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

革命與求學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四集目錄

今後同志應該怎樣努力

——在中央黨部講演的一——

各位同志。我們每逢開會，總要讀 總理的遺囑。遺囑上說，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應當怎樣怎樣努力。同時我們常常看見 總理遺墨裏面，也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兩句話。足見這兩句話，實在是 總理給我們的很重要的教訓。究竟革命如何才算成功，如何還不算成功呢。遺囑上既說，必須依照 總理所著的三民主義等等，繼續努力，以求貫徹，足見主義如果沒有貫徹，革命總不能算成功。照 總理的解釋，最低限度，求到中國之自由平等以後，才能算革命成功。試問我國現在，求到了自由平等沒有呢。那麼現在雖然軍政時期已過，雖然已用兵力掃除了革命的障礙，革命仍舊不能算是成功。大家知道，現在比以前不同了，現在全國統一了。我們便就這統一兩個字來說吧，對於這兩個字，我們的工作究竟完成沒有完成。統一這件事，是全國人民無人不希望的。不過各種人對於這件事

的見解，却深淺不同。大略數來可分七種。

第一種是老百姓的所謂統一。既經統一以後，可以無內戰，全國可以和平，大家能夠休養生息。我們既說軍事時代已過，革命障礙已除，對於老百姓這點要求，當然要承認的，這是統一當中基本的情形。第二種是政治當局者的所謂統一。全國人民和機關，從此都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就是統一。這個見解也是對的。如果今後各地方仍各自為政，中央的號令仍不能普遍於全國，那還能算統一嗎。這兩種統一的解釋都不錯，不過粗略一點，不是統一的完全意義。另外我們就維持今後永遠統一的方法說，原有藉武力，藉政治，藉經濟的三種力量，那便又是對於統一的三種見解。藉武力來維持統一，這個辦法有許多國家是做得到的。但在中國，單靠武力去維持統一，總歸不夠，而且結果反而要弄得不統一起來。即以我們目前所形成的中國統一而論，那裏完全是靠的武力嗎。如果沒有主義，沒有政策，沒有黨員和民衆的努力，連目前這個統一的結果，也不會實現得這樣快吧。歷史教訓我們，專以武力去統一中國，總是做不通。從袁世凱到張作霖，一切情形如何，結果如何，不是很清楚的嗎。

初初的袁世凱攪，還勉強支持了幾年。但是愈自命能夠支持的，結果崩潰起來便愈糟。袁氏以後，迷信武力的局面，愈攪時間愈短促，真是每况愈下了。而且你要用武力去統一人家，同時人家便也用武力來反統一。以前馮國璋，唐繼堯等所謂督軍團的對袁，後來孫傳芳，張宗昌，唐生智等等的對直對奉，不都是如此嗎。這樣的武力統一，是專以造成個人的專制而已，沒有其他的要求，結果如何會成功呢。這一層大家多已明白，不必細說了。其次藉政治的力量來統一的，與前不同，是用和平的政治手段，來消弭各地方的割據分裂，和各個地方長官的跋扈專橫。一方面以內政的修明，外交的順利爲本體，一方面以一切政策法律制度爲工具。近世許多國家，如美如德，都是由許多小國統一聯合而成的。他們當初並不用武力對付各地方，只用政治的進步，政策的推行，使各地方漸漸趨向於統一。另外還有在一種極自然的態度之下趨向統一的，就是經濟統一了。經濟的力量所到，是無界限的。譬如兩個不統一的地方，如果彼此交通便利了，經濟上的種種關係密切而且調和了，這兩個地方自然就漸趨於統一了。德國大戰以後，要賠大宗的款，借下大宗的債，急於要增加生產來應付一切

，因而許多交通機關，經濟制度的統一，從前帝制時代所做不到的，現在都做到了。經濟統一的力量所到，全國統一的精神便比前更進步了。這兩種統一力量的養成，和統一方法的實現，固然很好，與用武力的不同，但是這樣的事情，要慢慢的來，不是一時做得到的。除掉這三種統一的方法以外，還有一種，我們現在馬上可以做到的，就是先統一黨員的意志，然後以統一的黨去統一國家。如今不是要以黨建國嗎。那當然先要以黨來謀全國的統一。但是如果黨的本身尙未統一，黨員的意見尙未一致，那還有力量去建設統一的國家嗎。譬如軍隊的作戰，軍長要這樣，師長團長連長排長要那樣，軍隊本身是分裂的，作戰的情形只有七零八糟，結果只有打敗仗了。我們現在一面建設，一面還要努力和敵人奮鬥。我們奮鬥的對象，依然是共產黨和帝國主義。如果大家意見仍不一致，只有爲敵所逼而失敗，到那裏去談統一國家和建設國家呢。對於我們的國家持觀望態度的人很多，大都因襲着全部的帝國主義。他們不願意我們統一，說笑話，他們只盼望我們統二統三。東邊結合一派，西邊聯絡一系，都離得中央遠遠的，成了這種局勢以後，他們才好從中作弄，縱橫掉搗起來，以遂他們侵略

的私願。如果我們真統一了，他們何從施其技呢。何以我們一定要東三省歸服到國民政府的統治下來。何以我們要如此，就有人暗中阻止破壞呢。凡是我們的敵人，都不願我們真統一。我們國家的敵人如此，我們黨的敵人也如此。既然以黨治國，以黨建國，那麼敵人對於我們黨的統一尤爲嫉忌，破壞的手段便格外來得厲害。他們自然也望我們的黨統二統三，乃至於統到無窮而不願他統一了。黨內無派這句老話，當現在全國統一伊始，以黨建國開端的時候，凡我同志，能夠一毫無忽略嗎。最後對於統一的第七種見解，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以黨統一，或黨的統一，統統要統一於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之下，並不是統一於某一黨員，也不是統一於黨中某派。我們看看本黨過去的历史，我們就該覺得這樣的去謀黨的統一，是錯了。所以我們對於統一這件事，固不能只有老百姓和政治當局所有對於目前統一的粗疏見解，並且要想到今後我們用甚麼方法去永遠維持這國家的統一。而在用黨的統一去維持國家統一的方法之中，我們尤其要明白黨的真正統一，是統一於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之下，而不是其他。黨真能統一，國家才真能統一，三民主義才能漸漸的貫徹，而我們的革命工作才能上成功。

之路。我們每讀 總理的遺囑，豈不都應該感覺到這一層嗎。

現在再來談談我們青年同志今後的切實工作怎樣，應該怎樣努力。總理說過，革命愈進步，同志的工作愈嚴重。愈應加倍努力。現在中外人士，無論對我們抱好感或惡感的，衆目睽睽，都在一旁看着我們，究竟能否負起建設中國的責任。我們應該讓他們看到的，第一自然是上面所說，大家先求意志的統一了。要意志統一，必須先有共同的信仰。信仰是一種智識的表現。我們對於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先要由我們的智識界來將他認識清楚，不能有絲毫的懷疑，或將其他的主義政策，參雜絲毫進去。不但不能如此，且不應如此。我們能夠知道如此，做到如此了，大家的意志自然就統一了。第二，我們今後不能僅有理論上的探討，而沒有實際上的進行。譬如民生主義和政策如何如何，總理已經在遺著上說得明明白白了，我們只要趕緊依照他逐步去實行就是。我們現在只要問自己，確實是能做那種工作的，我們趕緊就去做。已經負了做事的責任的同志，便這樣去做，那末會到負責做事的時代，而仍是專門求學的青年，便一心去爲黨爲國，刻苦求學。總理早已說過，革命的基礎是在高

深的學問。我們現在正要表現給人家看，我們的黨確能負起建國的責任，如果我們黨員做事的不肯切實做事，求學的不肯切實求學，反而終日空言議論，怨天尤人，人家對於我們的印象將如何呢。近來的青年，或是我們的同志，每有許多的誤見。如黨權高於一切的一句話，原是說在我們各人的上面，有一個黨，黨的權高於我們的一切。並非說我是一個黨員，我有黨權，所以我便高於我以外的一切。黨員正應該民衆化，平民化。若離開黨的工作時，原和民衆一樣，那裏是甚麼特殊階級嗎。我們今後做黨的工作，若把黨員來代表黨，若把黨權高於一切認做黨員之權高於一切，那就誤事不淺了。黨員是要做民衆運動的。做民衆運動的人，要去感動民衆，而不是去煽動民衆。煽動民衆很容易，只要把民衆的心理一時加以催眠或麻醉就行了。但是民衆過後一想，於他們無切實的利益，他們也不再上當，便不動了。要感動民衆，固然應就民衆本身的真正永久利益上着想，凡是做這種運動的人，還須將自己的虛矯浮誇，種種面目，破除乾淨，以平等的地位，誠懇的態度對人，人才會被感動呢。所以誤解黨權，誤黨誤己，實在是我們今後努力工作中所要切戒的啊。

這裏可以順便說一說，國民黨的如何要青年，如何要民衆。現在我們的敵人造謠說，國民黨不要青年了，國民黨不要民衆了。真是笑話。國民黨那裏出了告示，說本黨從此以後，建設在空中，青年民衆，一概都不要了嗎。國民黨如今正在培養青年，訓練民衆，指導大家如何去共同完成國民革命，誰說不要青年和民衆的呢。但是有時却教敵人得施其鼓惑的言論，原來許多地方的民衆，被他們攪的糊塗了，國民黨一時不能把民衆回復轉來，便暫時停止那地方的民衆運動，並無所謂不要民衆。而且所謂暫時停止的，也不過是那幾種表面的運動而已，至於事實上，永遠沒有停止民衆運動的時候。譬如向民衆布告甚麼事情，甚麼主張，地方上有甚麼事，隨時幫助民衆去做，不也是民衆運動嗎。從消極方面說國民黨對於一般的工會並未解散，學生會也並未解散，不要民衆這句蜚語，到底從何說起呢。共產黨的口號，原有一句是擴大敵人的弱點。敵人身上被蚊子咬了一個疙瘩，他們便要從顯微鏡裏去看他，或者設法將他攪的破爛起來，扯大開來，好遂他們別的私願。國民黨是愛青年的，領導青年的，順着青年應有的志願而加以利導的。絕不忍誤青年，犧牲青年，絕不領導青年到反革命的

的路上去，或離開了他們所應該認定，應該信仰的主義，和應該擔任，應該完成的使命。十五六歲的青年，共產黨會派了去做縣長，或是做甚麼全省民衆大會的主席。任憑這位青年的天才再高些，他總是個學問有限，經驗有限的人，而任這樣與千萬人有關係的大工作，試問事實上結果會好不會好呢。試問這樣究竟是要青年呢，還是害青年呢。這原是他們對於青年的一種利誘的方法。兄弟去年做了一篇關於青年煩悶的文章，裏面對於共產黨怎樣陷害青年的種種方法，說得詳細，這裏也不贅述了。總之，故意放縱青年，教他們失却青年所應有的一切寶貴的力量，而終久挾持之，殘害之，置之於死地而後已，這就是他們的要青年。共產黨在廣東的辦法，是獎勵東江的青年去殺，而獎勵海南的青年去淫。殺便要兒子殺老子，媳婦殺翁姑，才算得是殺。人類原有一種獸性的，平時潛伏着不顯，一經煽動，便表現出來，甚至發狂了。所以東江有些青年婦女，將翁姑殺死，用長矛挑起來給人看，謂之努力革命，大義滅親。東江民風強悍，所以他們導之如此。至於海南的青年縱淫，結果可就更糟了。現在有許多青年已經回頭，不共產了，但是還有一件事大家看不過的，就是他們甚至兄弟

姊妹，也淫亂不顧。問問他們，說是弄慣了，一時改不了。倫理，道德，衛生，甚麼都不講究，墮落一至於此。照這樣先獎勵青年的發展獸性，加以殘害，然後利用爲工具，這就是共產黨的要青年。國民黨是寶貴青年的。既是青年的同志，就是對於主義已經有了信仰的人了，當然格外要寶貴。就是對於普通的青年，爲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設想，方維護之不遑，怎麼捨得糟踏一點點，又何論去殘害他們，去犧牲他們呢。同時我們總極力設法教一般青年對於事理能夠多明白一點。因爲只要是多明白一點的人，就不至於上別人的惡當了。現在可以舉一件事實來證明。廣東香山有一個某村，人民的生活還好，可算是家給人足。去年共產黨在廣州大燒殺的時候，忽然有許多紮紅帶子的人闖進村來，自命爲共產黨。村中少數的青年，這時也說非共產不可了。所幸彼此總是少數，所以氣餒還不張。當時便有比較明白的青年，對外來紮紅帶子的朋友說道，你們要共產，打算如何共法呢。對方說，田要給耕的人，不能給地主。大家說，好，就給耕的人。但是占了田去要耕，不能聽他荒。對方又說，房子要給工人住，不能給有錢的人住。大家說，好，就給工人住。但是占了房子去要住，不能燒。對

方又說，老頭子要聽我們青年的話。大家說，好，就聽你們的話。但是你們要對他們好好的說話，不能殺。如此繫紅帶子的朋友也再無話可說，就那樣在村裏攪了三天，做不出甚麼亂子來，覺得無味，也就揚長而去了。這裏內部附和的青年，見這情形，想殺也殺不起來，想燒也燒不起來，想搶也搶不起來，一團獸性，早已銷散，便悄悄的把紅帶子除掉，重行反正，做老百姓了。據此看來，共產黨遇到稍微明白一點的民衆或青年，也有技窮之時。那一味跟着殺人放火的，總是些被一兩句煽動的話迷惑以後，便沒有回頭思索的能力，只管聽獸性去支配的了。青年是容易覺得現狀不滿的。血氣正盛，是容易被衝動的。好奇心與好玩心很重，是容易被誘惑的。但是也要看其人基本理智的有無。是有基本理智的，能夠剖解事實，一時縱被衝動，被誘惑，總還有限。轉過身來，總有神智清明的時候，總有定心回想的一霎那。我們至少要設法普遍青年和民衆的這種基本的理智，而絕不肯殘害青年和民衆，也不想利用青年和民衆，這就是國民黨的要青年，要民衆。現在索性把青年不滿現狀的一回事。詳細談一談吧。不滿現狀，是青年應有的心理。大家對於現狀，如果總覺得滿足，那就完了，

甚麼都不會進步了。當滿清盛時，國力豐富，物價便宜，一塊錢買到一百斤米，當時的人也覺得這種日子好極了，滿足了。但是一經覺得滿足以後，到底結果是怎樣的呢。處在目前這個世界裏，更從那裏去說到滿足二字。總理既說革命尚未成功，我們做到現在，的確離革命的成功尚遠，我們又到那裏去找滿足呢。但是現狀這個東西，我們一面不滿足他，一面僅僅咒他，罵他，他就會教我們滿足了嗎。我們自當先確定下一時認爲比較滿足的標準和理想，然後設法教現狀逐漸的和這種標準與理想接近。如果亂了章法，由不滿而怨望，而搗亂，好像紮了紅帶子亂闖的朋友一樣，動機雖或有可原，結果造惡無窮，可就不堪設想而無人原諒了。而且我們對於現狀第一步既覺得不滿，與不對，第二步還要追求他何以不對，第三步還要計畫到如果我們來做，怎樣便對，怎樣便有把握。如果只有第一步，而沒有第二步和第三步，那我們的思想也太粗率了，我們的意志也太單簡了，於事究有何補呢。外國人常常說中國人專講原則，不講細則。現在我們已到了建設的時期，凡事應該講講細則才行。譬如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件事，中國在國際上應該與他國有平等的地位，這是原則。但是怎樣才算得

是平等的地位，這種平等的地位如何才能得着，其中却有無窮的細則在，凡是希望趕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有功夫都得研究研究才好。最可笑的，如前清政府和外國訂條約，第一條各國也允許他們訂下說，以不妨害大清帝國的主權爲原則。但是後面一條條的細則，却把這第一條原則斫得乾乾淨淨。而訂約的大臣看到已經訂下的那第一條原則，心上已十分滿意，下面的細則如何，便不與人較量了。原來許多事情，也不但法律條文是如此，細則是可以暗中取消原則的。我們以後對於建設的事業，如果粗心浮氣，不肯精細，凡事只攪個粗枝大葉，那一定要吃大虧。譬如我們要有民衆運動，不錯，這個原則甚好。但是細則呢。如果攪得不好時，會變成另外一件事，把民衆運動得離開本位，把學生運動得不是學生，把商人運動得不成商人，把工人農人運動得非工非農。或者所謂運動乃煽動，感動，盲動，亂動，乃至於反動。結果和前清的糊塗欽差大臣訂條約一樣，總是個適得其反，而全無是處，豈不可歎呢。所以原則下有細則，理論下有內容，標題下有實際。我們批評一件事情，銜定一個制度，都要面面顧到。所謂現狀有現狀的實在，所謂不滿也有不滿的方法，都不是簡單輕忽的事

。我們不是隨便可以抓到現狀的，也不是隨便可以說個不滿的。這一層意思，越是我們誠懇有爲的青年同志，越要明白得十分透澈才好。我們遇事不要操持過急，說話不要輕易出口，而不負責任。詳細的研究討論過了，事實的內容，和自己的分際，都顧到了，然後再對人下批評。我現在就青年本身的事業，再說一個例子，好讓青年對於這種道理，格外體會得切實一點。全國的學生總會，和各地的分會，都是青年自己辦的。假設有人在學生總會裏提了許多有價值的議案，總會已一一議決實行了。但是事實上經費既絀，人才又少，時間更促，議決案不能一一實現。此時各地分會却全憑主觀去判斷，不用客觀的考查，對於總會的現狀，認爲大不滿，對於目前主持總會的青年，大施攻擊。總會的諸青年也覺得無辭以對，對於分會的攻擊，勉爲應付而已。而對於許多有價值的議案，不能見諸實現的癥結何在，彼此都不虛衷細心的去研究，反而擱置起來不管。於是喊的，辯的，儘管熱鬧，於事終於無補。我們看這時大家如果肯實事求是，尋着根源，改過計畫，定下步驟，然後團結力量，寬假時日去做，又何患事情不通，而終久不得個比較的滿意呢。

這兩天內，有些事情可以報告諸位的。國民政府的組織法尚在審查中。關於這事的意見，原不當發表。但是外間對於這事，已有了很多的誤解，現在不妨就能夠解釋的，略說一二。外間有一種誤解說，如今到了訓政時期，應該先有約法，然後再講國民政府的組織法。不知政府的組織法關於最高主權之行使，乃約法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我們不能離開這根本的一部分，而去另求枝葉。我們正要在訓政時期，先定出一種相當於約法的政府組織法來，然後再徐圖約法的完成。試看各國完成憲法之前，不是先有政府的組織法嗎。憲法尚且如此，何況約法呢。我們要明白，現在是以黨治國，最高機關是中央與政治會議。目前祇要由這個最高機關裏定出那事實上最重要最需要的一部分大法來，好向前去做。其餘的要不要，按照何種方法去要，目前尚不成問題。世界各國每有合數種法而成爲最後的憲法的。我們千萬不要又走民元的那條錯路，拿出整本的約法來，有法而不能行。何況那本約法，總理當日原不贊成。現在還有人主張說，我們如今何妨把那本約法再拿出來公布一下呢。這種主張，真太不合事實了。還有一種誤解說，五權憲法一定要到憲政時期才能頒布，如何可以提早到現在

便做呢。不知現在國府組織法內所定的五院，與五權憲法裏所定的正式的五院不同。現在乃於訓政期間，仿照 總理五權憲法裏面的意思，試行五院，以爲將來成立正式五院的準備罷了。五次大會中已經決定，按照 總理的政策去定開國的大法。我們依着這個議決案去做，有何不可呢。將來正式的五院，真正是分立的。上面沒有最高機關，只有國民大會。現在試用的五院，仍舊在黨的指導之下。所有國務的最高方針方案，仍由黨來決定。如今黨有指導政府的責任。由黨來定政府的組織法，也由黨來頒布。與將來的五權憲法和五院性質不同。現在凡是對於這事有誤解的，總由於沒有認清 總理的話。 總理並沒有說，未到憲政時期，不能用與五權憲法內容相仿的制度。建國大綱第一條說，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現在未到憲政時期，我們本五權憲法的意義，來擬定中華民國的大法，實在應該得很。如果五權憲法現在不能談，那麼根據這條大綱，連三民主義現在也不能談了。現在既不能談五權，那麼現在也不能建設國家了。政府組織法提案，中央正在審查。將來五院亦未必一定同時成立。如果現在不能行五院制，那麼四院又怎麼樣呢。三權既然

可以，五權難道就不可以嗎。廣東當年開府時，就有監察院了，是總理主張的。何以一個相同的政策，在從前軍政時代已可以用，現在到了訓政時代反不可用呢。總之，現在擬行的五院，是根據的五權憲法的意思，而並非憲政時期所有的五院。同志先要認清這一點，然後再去討論這個問題。

再則討論歸討論，却不可藉以對人，別有作用。討論的結果如何，儘管供獻中央採擇，不宜對外發表，而互為聲援，自稱擁護。現在大家常說黨要軍隊化。如果軍隊裏，軍長擬了一個作戰的計畫，尙未決定，而師長去找了團長，連長去找了營長，各人先發表了各人的主張，各自說，你們擁護我的主張。這樣軍隊到底能不能作戰呢。我們黨的軍隊化，難道就是這樣化法的嗎。這是黨裏的一個紀律問題，大家不可不注意。再則中央正在審查中的重要提案，不應向外發表。重要的法律，未經成立，不由正式公布，就先把草案白露於外了，世界各國，無此輕忽的舉動。中央會議席上大家原相約保守秘密的，而結果終於流傳出去。做這種流傳工作的人，未免太忠於報館，而不忠於黨國了。總理從前在廣東時，因為常有秘密

的消息走漏出去，曾經下過手諭說，以後再有秘書兼新聞記者職務的槍斃。發表一篇稿子，看上去是小事，但是如果把他的動機和結果仔細研究一下，關係就大了。明知不能發表的東西，偏發表出去，究竟是何動機呢。這篇稿子發表後的結果如何，姑不去論他，此風一開，以後黨中應該秘密的總不秘密，那一來究竟會得着個甚麼結果呢。大家同志以後對於這類事的輕重，要認識清楚，十分留心。這也是黨裏的一個紀律問題，今天特地說明一下。

我們如何紀念國慶

十七年雙十節後一日在中央大學演講

雙十節是 總理的主義，先烈的犧牲，人民的痛苦，換得來的——雙十節的意義與價值，到今日而愈加完成，愈加顯著了——由既往的昭示，定未來的南針，是慶祝中最要緊的一件事——辛亥革命所以未成的四大原因——反革命的勢力，今後一毫不容存在——對於總理的信仰，今後人人都要是絕對的——訓政期內，國民依然要負責任——目前的統一，是國家空前未有的時機，同時也是最嚴重的時期——

各位同志同學：今天兄弟想講一個題目，『我們如何紀念國慶。』因為今天尚在國慶慶祝期中，諸位今天所舉行的這個演講會，也是慶祝典禮中的一部分，所以現在是應該講這個題目的。我們知道今年國慶的慶祝，比過去的十六個年頭中所有的國慶慶祝不同。今年國慶，全國國民的歡欣鼓舞，真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固然因為此番國慶紀念是適當北伐成功，全國

統一以後，與過去十六年紛擾割據的情形不同；一方面也實在因為雙十節這一天，乃我們民族的絕大紀念，而其意義與價值，到了目前，乃愈加完成，愈加顯著，所以大家慶祝得比往年愈加熱烈。要問雙十節的意義與價值究竟如何，我們只要看雙十節這個紀念日是如何得來的。原來雙十節乃由總理創立了三民主義，由三民主義的實現而來的；同時又是以往諸先烈的犧牲和鐵血所演成的；同時又是因為四萬萬國民已有了相當的覺悟，先受了莫大的痛苦，然後才換得來的。所以辛亥那年武昌起義未久，而全國便都響應，共同起來，於最短期間，推翻了二百六十餘年的滿清政府，這是我們整個的民族精神的表現，偉大力量的表現，足夠給世界各國認識一番了。何以說他的意義與價值，到了目前，乃愈加完成與顯著呢？在我們北伐未曾成功以前，全國未曾統一以前，外人每多懷疑，以為國民革命軍未必有統一全中國的力量，或是以為中國國民黨未必有統一全中國的力量。兄弟適在外國，便告訴他們說：「你們不知道中國國民革命何以起的，不知道國民革命軍的真實力量何在，不知道中國國民黨何以能領導國民革命的。你們尤其是把中國十七年前的革命歷史忘記了。現在我國的國民

革命軍，國民黨，都不是新興的，初創的，突如其來的，乃由從前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軍，同盟會而來的。如果不知道我們革命的歷史，革命的主義，和我們黨的領導民衆，努力革命，既往的成績，自然對於我們目前的一切，有所懷疑了。『照此看來，沒有十七年前的革命根底，是難有今日的北伐完成，全國統一；沒有目前的北伐完成，全國統一，本黨在十七年前的革命成績，在一般人的意想當中，幾幾乎完全埋沒了。而十七年前革命得來的雙十節紀念日，其意義與價值，豈不是至今日而愈爲完成，愈爲顯著嗎？』

因爲其中有這種情形在，所以我們今年的慶祝才格外來得高興；而我們在十分興高采烈的慶祝之中，又如何能不把這紀念日本身的重大意義與價值，鄭重思考一下？又如何能把總理主義的偉大，先烈犧牲的悲壯，國民痛苦的深劇，忘掉任何的一件，而徒然熱鬧一番而已呢？

在我們今年熱烈的慶祝之中，還有一層不可以不念到的，就是自從辛亥十月十日以後，推翻滿清，成立民國，而民國何以只有一塊空招牌，並無內容，並無實際？本黨領導革命，

到了那年，應該成功，以後何以革命的目的，和人民的要求，仍不能達，仍未成功，而需要重新革命？這一層我們不但在慶祝中要念到，並且要查考，要追究，能得着一個切實的原故才好。這種查考追究，並不是對於既往的批評，實在是求得對於今後的教訓。因既往的昭示，而定未來的南針，實在是我們在慶祝之中最要緊的一件事啊。這種切實的原故，說來不止一個，却有四層——

第一，辛亥革命以後，不應該容留反革命的勢力存在而不與剷除，讓他潛滋暗長起來，終于破壞了革命勢力，而革命之功于是未成。當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時，反革命的首領袁世凱，表面也贊成共和，因而有南北議和的局勢，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這件事說起來真是莫大的錯誤！試思本黨所以革命的，目的原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滿清政府對內既專制萬分，不與漢族的自由平等，同時又不能代表中國，去抗拒外人，又引了外人的一重壓迫，加在國民身上。我們爲要在內外兩重壓迫之下，求得自由平等，所以非排滿不可，非推翻帝制不可，非建立民國不可了。即除開自由平等，單就國民生計而論，那時因爲皇帝官吏的剝削，因爲

國內實業在帝制之下永無發展的機會，民生已凋敝到萬分，爲替國民求出一條生路來，也非實現一個比較能夠解決民生問題的政府不可。本黨所以革命，所以建立共和，原是爲的這些。至於袁世凱的贊成共和，與推翻滿清，却爲的甚麼呢？原來他爲的是團結反革命的勢力，把滿清的專制，滿清的帝制，一步一步的轉移到自己方面來罷了。這樣一來，中國的自由平等，國民的惟一生路，到底在那裏？不料本黨原來是懷着一切革命的目的，爲了誤信他人，到後來竟把政權真個讓給反革命的份子，反而遂了反革命的心願，反而達了反革命的目的，因果顛倒，一至於此，真教人從何說起呢！反革命者一經革命者予以信任批准以後，勢力自然逐漸發展，逐漸澎漲了，一班滿清帝制的餘孽，於是通通轉一個身，一變而爲洪憲帝制的功臣，立足格外穩固，蔓延格外迅速了。一方面把當時的革命力量，消滅個乾淨；一方面又形成無數的軍閥，興起了國內十幾年的內亂。大家所行所爲的，前後一轍，無非是賣國求榮，忍辱苟活，有甚麼民族的思想！跋扈專橫，恣睢暴虐，有甚麼民權的顧慮！殘民惟恐不甚，殃民惟恐不力，有甚麼民生的打算！大家是整個的在那裏反革命，反主義，即令當日那

點革命勢力，幸而得與反革命的勢力並存，也何足以進而談甚麼實現主義！主義如果不實現，革命又到那裏去成功！所以辛亥以後，革命的所以不成功，細想起來，錯交政權與袁世凱，縱容反革命的勢力滋蔓不已，貽禍無窮，把革命的勢力完全壓下去，真要算是第一個大原因，過去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得很清楚了。

第二，辛亥革命以後，黨員不能十二分信仰 總理，對於 總理的主義，政策，方略，通通不遵守，不按照實行。 總理的一切大計畫既不能實現，於是民國空有其名，革命祇做了破壞，而沒有做建設，所以就不能算是成功了。這層意思，盡人皆知，本來可以不必再說了。不過兄弟所覺得痛心的，當時不但一般的黨員不十分信仰 總理，連重要的黨員對於 總理的信仰也不夠。我們只要看後來陳英士先生給黃克強先生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了。這封信裏說，某種舉動未遵 總理的指導而致失敗，某種計劃未聽 總理的主張而致錯誤。試想陳先生黃先生跟隨 總理革命最久的人，辛亥以後，對於 總理的信仰竟也如此不夠，當時革命事業上所受的影響要有多大呢！倘若大家認識 總理既是創建民國的國父，對於國家民

族的情形，世界各國的大勢，又都有深切的觀察與研究，那便上下一心，完全信仰他，聽從他的指導去做，當時雖有反革命的力量在，革命的事業又何至於一敗塗地呢？我們按照歷史觀察評論起來，以總理那樣獨力創造民國的精神和功業，實在是超邁古今中外一切的。即如美國的華盛頓，也還不是獨力創造美國的人，他不過帶著美國的兵，去抵抗了英國，然後穩固了美國的國基罷了。至於總理，在絕無民國之前，在全國人民心中絕無此想之時，一人獨自奔走海內外，艱苦奮鬥了數十年，然後才號召起一班同志，去創出一個民國來。對於國家有這樣的偉績，豈是世界上泛泛的政治家所能比擬的嗎？而這班同志，一經破壞業成，對於他的信仰，首先就搖動起來，甚且和非同志一樣；雖然事後也有知道懊悔的人，可是當時對於總理，總是不識不知，懷疑滿腹，以致一切措施乖張，教民國既立，共和既成以後，復行攪出帝制來，復行攪出十幾年的軍閥反革命來，於是民國有名而無實，而革命的大業，也終於未成，大家試想，痛心不痛心呢！回憶起那時黨員對於國事的情形來，真覺可歎可笑。議和則惟恐其不成，既成便以爲天下大定，對於總理的意志，是多方阻撓；對於袁世

凱的舉動，反則百般原諒。如 總理的意思是定都南京的，一時竟無人附和；本來說大總統到南京來就職的，後來大家也不堅持了；建築鐵路的大計畫，是無人過問，聽 總理一人提倡；紙幣政策可以抵抗外人經濟侵略的，大家也不懂不理， 總理許多的建國大計，當時黨員且不明白，不肯宣傳，不肯實行，國民更無足論了。所以直到現在，大家所認識的 總理的主義與政策，如何內合國情，外應時勢，照他去做，如何可以救國建國，乃至於進國家世界於大同之域，而以我國來領導世界的文明，現在看到如此，在當時大家却總以為是 總理的理想太高，萬做不到。「理想太高」四字，還是當時黨員對於 總理的批評，至於一般談論總理的人，竟喊 總理爲「孫大炮」，以爲 總理只會說大話而已。那時大家看見 總理動輒以維持將來世界永久和平爲己任，志趣這樣的崇高，眼光這樣的遠大，祇覺得 總理是發了誇大狂，並不覺得自己的淺陋不堪。唉！像 總理這樣的誇大狂，中國實在已幾千年來沒有人發了。虧的還有 總理一個人發發這種狂，然後今日才有這幾千年來所未曾有過的中華民國。我們如果信仰 總理這種崇高的志趣，遠大的眼光，照他的遺教做去，那未來的中華民國

國和世界，還不知要如何的莊嚴燦爛呢！且說當時大家既覺得 總理是發狂的人，黨員不信仰，國民更不認識，那麼大家究竟認識甚麼，信仰甚麼，覺得甚麼才是誇大狂，而以為可靠的呢？那就有『維持現狀』，與『非袁莫屬』兩句話生出來了。這兩句話原來是一呼一應的，作用很大，當時竟有人大為宣傳，用以壓倒一切。但是我們試問：剛剛推翻了滿清，一切尙未建設，有何現狀足以維持？仍舊維持滿清時代的現狀嗎？那又何必有辛亥革命？把滿清換個袁世凱，其餘一切的現狀便值得維持下去嗎？那麼辛亥革命的意義與價值，當真便如此微賤不成？這『維持現狀』的四個字，恰是大家都用以批評 總理的『理想太高』四個字的反面。大家的心理既然是寄託在這四個字上，當然要撇開 總理那種誇大狂的人，不予信仰，轉而另覓那種能照這四個字實行的相當人物，於是又逼出『非袁莫屬』的一句話來了。我們試想：袁世凱乃反革命的首領，『非袁莫屬』就是說『非反革命莫屬』。在辛亥十月十日運動的前後，大家總覺得是『非革命莫屬』的，何以剛剛一番『非革命莫屬』以後，馬上接着又『非反革命莫屬』起來呢？世上的是非顛倒，有如此荒唐的嗎？當時身為革命黨的黨員，竟糊塗到這步田地

，真是千古奇談啊！既然連革命者都覺得『非反革命莫屬』了，那麼反革命者自然當仁不讓，實行其反革命而毫不客氣，革命的成功，就此無望了。這其中的責任，究該誰負，不是很明白的嗎？所以黨員不信仰 總理一層，就不得不推爲辛亥革命所以未成的第二個大原因了。

第三，就要怪到國民的不覺悟，不負責了。辛亥以後，國民對於革命，奇怪得很，也是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以致反革命的勢力日漸伸張，所以籍民愚民的則無所不至，至於民權民生，則一樣也談不到，而革命的功業，乃終於未能完成了。當武昌倡義以後，舉國響應，不爲不快。各地不但黨人領導着運動，連國民也跟着運動，大家都覺得滿清非推翻不可了，就此羣策羣力，一鼓作氣，把他很快的推翻掉。國民的精神，原也十分可佩。如革軍與清軍在漢陽大戰時，民衆不畏砲火，在前線上挑水送飯，運輸給養，很告奮勇。當時局勢未定，勝負未分，革軍正沒有辦法，賴有人民這樣的幫助，占了不少的優勢。這種輸誠合作，實在不僅古人所謂箠食壺漿；箠食壺漿不過是歡迎慰勞的表示而已，還不足爲奇呢。但是一經破壞以後，臨到建設，國民不但於實際事業上無所表見，而且心理上反而顯出三個大弱點來

，把整個的革命功業，直接間接，誤個乾淨，說起來也很痛心！第一個心理上的弱點是苟且心。大家以為大亂過去了，趕緊休養生息吧，不必再鬧了。革命黨員畢竟是含有暴烈性的朋友，現在用不着他們了，同他們疏遠些，另外接近穩健派的人物吧。原來我國國民識字不多，知識太淺，又未經訓練，不耐艱險。好像一個性質不強的人一樣，不能跑路，跑了一程，已出了一身汗，馬上就要歇住腳來休息，也不管時機容許不容許停頓，而真正目的地相去尚有多遠，就此躺下來不再動，任你催促他也是無益了。第二個心理上的弱點是微倖心。以為過去已有的犧牲，或者已經夠了，夠達所求的目的，不必再多奮鬥了。大家總想以廉價來買得貴物，實際上有無把握是不管的，只望其微倖而中罷了。有這種心理的人，也未嘗不想革命的目的真正達到，不過一對他談起根本的計劃，切實的工作來，他便以為可以毋須。所以像總理那樣的規模宏遠，而又辦法切實的人，總不投合國民的胃口，不但以為狂，甚且以為傻呢。第三個心理上的弱點是倚賴心。凡事託人去辦好了，自己一概不管。從上面兩個弱點中。他們認為滿意的辦法是『維持現狀』，認為滿意的人才『非袁莫屬』；『既經物色着袁世

凱這個寶貝，將國家重任付託給他以後，國民以為便無甚責任了。以後袁世凱究竟怎樣辦理，能否維持大家所望的現狀，在現狀以外他或者又會攪些甚麼鬼，通通不管了。其實袁世凱一面把滿清的不好現狀，果然整個的維持下來，一面自己又新興了許多害國殃民的花樣，而國民只是甘心受騙而已，別無甚麼表示，實在可憐得很。更如國會裏坐着許多議員，究竟是誰國民的代表；他們坐在那裏說些甚麼話，是否代表的國民的利益；後來袁世凱段祺瑞解散國會，是否即解散了大家的代表；議員本身的破壞約法，以及後來曹錕時代的賄選，應該不應該；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大家一概不管，不負責。既曰民國，而國民對於國家如此冷淡，如此放任，反革命的勢力那得不張，革命的勢力又那得不屈？大家起初在破壞的時候雖然出過力，把滿清推倒，到底革命的全功，真正的民國，又如何能致呢？

第四，國內的分裂，延長到十餘年之久，全是軍閥搗亂的局面，以致革命之功不成。這一層乃由前三層生出來的。反革命的勢力既張，黨員既又不信仰 總理，不奉行 總理的主義與政策，國民復始終不悟，不管事，不負責，那麼袁世凱看到各方面的情形如此，自然覺

得帝制大可以爲了。袁氏既然帝制自爲，然後偌大的中國乃四分五裂，彼此爭鬪，一時再也合不起來了。民元的時候，全國已呈分裂之象，中央與地方不相聯絡。袁氏的地位既固，便想對付革命黨人，於是黨人與非黨人之間，又劃了一條鴻溝。後來袁氏帝制的野心已著，黨人起兵討袁，袁却得帝國主義者三萬萬巨款，人心又受他蒙惑，討袁的革命領袖只落得失敗亡命，這時的中國真是非袁莫屬了。

袁氏對於黨人既無所顧忌，對於其餘的將領政客，更明目張膽的只要他們贊成帝制，別樣一概不管。如馮國璋雖然是個大軍閥，曾經焚燒漢口，殘民以逞，無惡不作，但是很怕袁氏；袁氏要他贊成帝制，暗中却引誘他以百萬的賄賂，同時拿來挾制住他。又如對於梁士詒，便以假造鐵路案件爲箝制，只要他去組織籌安會以實現帝制。在這種情形之下，人人對於袁氏，實在都懷貳心，軍閥割據的局面，便格外不可幸免了。袁氏亦未嘗不要統一，不過他要統一的動機太壞，專門爲自己要做皇帝而已，並非爲國爲公。而許多分裂的軍閥，也傳其衣鉢，臭味相同，誰也不是矢志民國的人；只要地位夠了，時機到了，誰都想做做袁世凱。

所以分裂的局面，固然由袁氏弄成，而且流毒之深，尤不可測；因為那時的軍閥，人人的心理都『袁世凱化』了，十幾年之中，縱裏橫裏，由一個袁世凱，化出百十個袁世凱來，以饜民國，還說甚麼革命的目的，焉有不愈趨愈遠的道理呢？這樣看來，上面所說的三層是因，這一層軍閥割據便是果；而這一個果，實實在在又種了民國十幾年內亂的因下去，把辛亥革命的使命，完全截斷了。

諸位啊！我們既考查了已往的歷史，知道辛亥革命沒有成功的四大原因，一一如上所言；那麼我們當然知所鑒戒，今後對於建設革命上，也應該知所取徑了。第一，反革命的勢力，我們今後再不容他一毫存在。我們知道現在所謂反革命的勢力，比十七年前的更來得複雜多了：一切帝國主義，惡化的勢力，腐化的勢力，通通環繞着我們，要消滅掉我們的革命勢力而後快。我們的奮鬥，能懈怠一毫，能因為破壞告終，全國統一，現狀較好，局面較安，而懈怠一毫嗎？第二，說到今後對於 總理的信仰、更屬人人最爲切要之務。總理既是創造民國的國父，對於國家民族的觀察，中外政治的研究，都很深邃，加以天才的聰睿，用功

的刻苦，早已爲我們定下建國的種種主義政策，俱臻十分完密周至了。今後我們不要建國則已，否則惟有對於總理絕對信仰服從，沒有人能夠違反一毫的。違反了總理所定的原則方略就是錯！民二民三之間的事實，已經完全證明了。今後我們如果仍想蹈那民二民三的覆轍則已，否則惟有走總理所指示的一條路！第三，現在國民也比較進步了，就要再如總理所言，後知後覺的人，對於不知不覺的人，趕緊竭盡啓迪訓導之責。在訓政期中，趕緊把國民訓練到能自治，能行使民權，好讓國家早日達到憲政的時期。尤其要緊的，是雖在訓政期間，國民千萬勿放棄責任，以爲自己的程度原不夠，便靜候別人來訓練好了，自己仍舊甚麼都不管，那是斷斷不行的。好比學校裏先生訓練學生一樣：學生如果無心求學，或是不肯勤學，一味被動，要先生來逼迫勉強了做，對於先生的教訓又始終不肯依從，把教與學的責任統統給先生去負，好壞學生是絲毫不負責的，試問這樣的學生，會訓練的好嗎？所以今後國民要深知訓政憲政，前後兩個時期的意義與作用。既是民國，絕對沒有一分一秒的時間，不要國民自家負責的。第四，再說到統一一層。如今全國人民是沒有一個不願意國家統一的

了，可是外人對我的情形，却仍分着兩派：一派是觀望我們究竟能否統一，如果能，便加以贊助；一派是始終不願我們統一，甚且破壞我們的統一。這兩派的人，都是與我們國家的自由平等極有關係的。我們萬不能教親厚者失望，而教仇視者快心。我們如果不能把目前的這個統一，很穩固的維持下去，我們就莫想廢除甚麼不平等的條約，就莫想求得甚麼自由平等了。而且統一又不僅是形式的，必定要政治經濟，各項實際問題，統統統一，真是一個整個的國家，表裏上下，都是一個系統，沒有絲毫分割盤據，阻滯歧異的情形，然後才可以對外表現出我們偉大民族的偉大精神，然後才能教好我者勸，而惡我者懼，然後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求得中國的自由平等，而革命的成功，然後才能實現！

同胞啊！同學啊！同志啊！今年的國慶，大家如此的歡欣鼓舞，的確是值得的啊！因為目前實在我國振興的空前未有的機會啊！但是同時也是我國最嚴重的時機，大家不可以不知道！大家試看看世界的大勢現在怎樣？許多先進的後進的國家，現在已進到何種地步？我們國家民族的環境，地位，前途，又是怎樣？這次統一以後，如果仍不能持久，或仍是有名

無實的，像這樣的機會，誰敢擔保以後再能得着一個呢！所以我們目前不容再轉別個念頭，不容再寬假一步半步了，我們惟有抓住這次惟一不二的機會，人人負責，努力向前，消滅掉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完全遵循着總理所指導的一切，建設起一個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來，以竟我們數十年前後一貫的國民革命的偉業，這就是我們今年如何紀念國慶之中，所望於全體同志同學同胞的了。

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年紀念日演講詞

十七年九月廿一日在中
央黨部

朱先生是最革命最奮鬥最忠于主義的人——總理說執信乃革命中的聖人——吳

戴汪蔣四同志對於朱先生的評贊——朱先生所得的遺傳與自己的創造——朱先

生的特性——朱先生在革命運動中的精神——朱先生在革命時期中的其他事蹟

朱先生的待朋友和待部下——朱先生殉國的情形——朱先生的文章——我們應

該怎樣去學朱先生

今天我們開會追悼朱執信先生殉國的八週年，要兄弟來追述一些朱先生生平的事蹟。中央宣傳部已出了一本今天這個紀念日的宣傳大綱了，裏面載着朱先生的傳略，想諸位已經看到；兄弟現在便就這篇傳略所未及的地方，補充一些吧。我們追悼朱先生，紀念朱先生，第一要知道朱先生是最忠於主義的一個人，最革命的一個人，追隨着總理，最肯奮鬥的一個人。朱先生在本黨初創的時候，固然十分努力，到後來也始終繼續努力下去；在本黨全部

的革命工作上，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地位，這是一班同志所公認的。我們偶爾回憶起朱先生來，要想把朱先生的生平，在短時間內，便說得清清楚楚，這是很不容易的。

記得八年前的今日，朱先生在廣州虎門遇難，噩耗傳來，總理正在上海，手持電報，十分傷心。大家都望着總理，總理長歎道：『執信乃革命中的聖人！』大家試想，總理對於朱先生的評贊是如此，我們怎能一下子便把朱先生的生平說得盡呢？後來廣州開追悼會，吳稚暉先生做了一副輓聯，大意說：得着一個廣州，失掉一個朱先生，實在不合算，價值不相當！這是吳先生對於朱先生的評贊，我們聽着，對於朱先生的景仰，又將如何呢？已將朱先生的生平叙得詳細，論得詳細的，有戴季陶和汪精衛兩先生，在民國十年所發表的兩篇文章。在這兩文以內，對於朱先生的事業文章，可算都表彰到了。此外蔣介石先生也對於朱先生所做的兵的心理及其改革，認真加過批評。蔣先生以為朱先生的志向很大，所有關於軍事的主張都很精。蔣先生說，自己願意完成朱先生這種志向。現在我們將以上所舉的幾個人對於朱先生的評贊，合攏來想想，對於朱先生已經夠崇敬的了，還要兄弟參加甚麼意

見呢？

不過兄弟和朱先生共事較久，相知較詳。對於朱先生的爲人，一時雖不能作有系統的敘述，也不妨枝枝節節的說一點，以見朱先生爲人的特性。先生是一個聰明人，極能讀書，悟性和記憶力最強；受先生的父親，朱隸垞先生的遺傳和教訓極多。朱老先生的學問很好，精刑名申韓的學問，所以遊幕四方。而性情異常嚴正，不與人苟同。曾在張之洞幕中，張無暇和朱老先生談話，朱老先生便留下一封信來，教訓了他一頓，拂袖而去。至於古文，詞章，隸書，草書，各種藝術，無一不精。尤精七絃琴，自稱琴王。朱先生所得的先天的遺傳既多，所以先生也多才多藝，也方正不阿，從不肯眨節，從不肯將就世俗；種種無聊的酬應，先生是絕不來的。所以朱老先生雖中年便亡故，雖然僅僅給了朱先生幼年間，短時期的庭訓，但是已立下朱先生一生爲人的很深的基礎了。以後朱先生便就這個基礎上，自家創造起一切來。先生通詩書以外，兼通數學，及許多科學，却都是自修得來，並不是從師而學的。先生既然聰明，只要把精神一集中在某件事上，對於這件事的成績，便與衆不同。既富天才，又

肯苦做，試想常人如何及得到呢？當先生留居日本時，早不幹科舉的那一套，也久已不弄數學了，而有些在日本數學院專攻數學的人，却來請教先生的數學。問起先生數學的學校修養來，不過在中學時代，曾經學過一二年罷了。舉此一端，就可見先生的悟性和記憶力，的確十分過人。先生學英文，不滿一年，便能看書。總理的實業計畫，有大部分是先生譯成英文的。先生學俄文，不過十幾小時，後來居然能寫俄文信給人。先生對於別的學問，固有突過常人的長足進步，就連對於語言文字的學習，也有這樣驚人的成績。這固然是他天才過人，也實在是他用心專一。原來先生專心為學時，甚麼都不管，甚至於不洗臉，不吃飯，只集中思想在他的學問的問題上。這種精神的專一，是古今大學問家的成就上必不可少的，我們看了先生也如此，教我們格外相信了。

其次談到先生的性情，還是從一些小事情說起吧。先生初留日本時，有兩件事情，大家看不過去的：一乃不剪辮子，一乃不剪指甲。有一次，兄弟和汪精衛先生同去勸先生剪辮子，嘵嘵不休。先生突然拔出小刀來，對我們道：『誰再勸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我們當

時覺得事出意外，只好彼此默然而退。足見先生的一切行爲，都有一定主張，不輕易因爲人言而動搖的。至於先生不剪辮子的主張如何，容後再說，這裏且說先生剪指甲的一回事。先生的指甲，實在長的厲害。而且不甚干淨。大家朋友常勸他剪，自然總是無効了。後來總理到日本創同盟會，先生毅然加入。那知一加入此會以後，先生的性質態度就大變了：從前固執而且古怪的脾氣，現在平易近人了；對於好友的話，從前深拒固絕的，現在亦漸漸容納了。這種情形，大家起初還不曉得。有一天，總理坐在那裏，看見先生的指甲實在長得不像樣，便說道：「執信，你來，你的指甲太長了，我替你剪掉吧。」先生聽說，很歡喜的走到總理面前，他的長指甲，就此教總理剪掉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却很可以看出先生的真性情來。至於先生當時不肯早剪辮子，是甚麼道理呢？原來先生對於革命的事業，不僅是一味的不怕犧牲，不肯降志相從而已；先生覺得最要緊的，是要達到目的，是要深入虎口。當時兄弟和精衛先生在日本辦民報，黨人花紅冊上已有了名子，落在滿清手裏，一時不能回國運動了。先生在民報上雖有文章，却署的許多別號，如蟄伸，懸解，去非等等，人不曉得這

些名子就是朱執信。所以他可以回國活動，他自然不該馬上就剪掉辮子，妨礙進行了。先生後來果然回國，借教書以謀活動。但是在教課中所編的講義，至今還有人拿來作那門功課研究的材料，因為編的實在好。凡事是經過先生的手的，總不肯絲毫苟且隨便，這也是先生的特性之一哦。

現在可以談談先生在革命運動中的精神了。最著名的廣州新軍之役和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從事諸同志中，實在以先生為主幹，不過人不曉得罷了。直到二十九日這一天，人也祇知先生是參與其事的一份子而已。這一回事，曾經兩度改期：先定了一個日子，因為有些事被敵人發覺了，馬上改過；那知已經運動成熟的軍隊說又調回省來，只好再改期，才定為三月二十九日。那天先生跑到總籌備的地方來，會見了總指揮黃克強先生，朱先生便表示對於日期的改來改去，很不贊成。而黃先生和林廣慶幾位烈士以為我們趕緊要有實在的舉動，準備犧牲，不能顧慮成敗。朱先生贊成，馬上自己加入衝鋒隊。衝鋒隊本來預備五百名，後來減成二百名，而臨事真去衝鋒的，不過一百餘名而已。其時事出倉卒，許多都不是原定的

計劃，大部份的同志都在香港。兄弟和趙伯先先生晚上才趕赴省城，而他們下午已經發動了。且說那時大家都不知道朱先生能夠幹那一套，只見他穿着兩截的長衫，舉動很不方便，問他這怎麼辦。先生道：『這有甚麼難？』說着借了一把刀，丟然一聲，馬上割去長衫的下截，只留着上截。大家看他那種剛果毅勇的神情，不覺個個肅然起敬。誰知先生外貌雖弱，那內心的義理之勇，一經發動，却是最強最大的呢，後來先生和黃先生一同衝入督署，搜索張鳴歧不得，復行衝出來，向雙門底一路衝去。先生先不拿手鎗，祇拿了兩個炸彈。兩彈丟完以後，手和胸口都受傷了，自己也不覺得。看見身旁躺着一個受傷不起的同志，手裏還拿着鎗，先生便奪了那枝鎗作為他的武器，當朱黃兩先生退出督署時，李準的巡防營等已經開到，餘衆便被衝散；只餘先生等少數人，在永漢路一帶沿路放鎗。黃先生有一枝駁壳槍，子彈很多。先生一枝槍的子彈，却老早放完了。許多官兵到了永漢路，看見黃先生放鎗，便圍上去，反把朱先生隔在後面。先生見子彈已完，便丟掉鎗，逍遙自在的在路上走，官兵也看不出他是革命黨。後來先生轉了灣，在橫街上看見有幾個方言學校的學生，是先生介紹入盟的，

住在那裏，先生便混進去。大家見先生遍體是傷是血，都上前來慰問。先生只管搖頭說：『不要緊，不要緊。』過了一夜，到了明天，先生竟從容出城而去了。我們看先生臨事這樣勇毅鎮定的工夫，實在是常人所做不到的。尤奇的是先生平日的胆子極小，一隻碗盞忽然落地，或是敲門的聲音大了一點，先生會嚇得兩腿發抖。後來人問先生，三月二十九日那天，何以會全改常態。先生說：『我本來沒有胆，那一天還是沒有胆，不過既臨大事，曉得是要拚命的，就上前去拚而已。』據此可知先生的勇，絕非血氣之勇。先生二三十歲時，身體很壞；但是先生的精神，却是自強不息。後來身體漸強，但是那點點健強，實在不夠發出那種臨大事時他所有的大勇來；這種大勇，是完全從義理上發出來的。先生的理智過人，洞明利害之處也過人，然後見義勇爲也過人。這樣激發出來的勇，實在至大無上，絕非尋常血氣之勇可比了。

此外先生在革命時期中的事蹟，還可以舉幾樁談談。辛亥革命時，廣東的獨立，也是先生努力底成的。這不但以前和現在的同志大家承認，就是在廣東曾經反對過我們的人，也無

不承認。當時的獨立，全由先生計畫，運動，駕馭，然後方得成功。先生做事，與衆不同，不居名，不居功。暗中做着一個很大的運動的中心人物，凡事硬得很，絲毫沒有妥協。事情應怎樣辦，便非怎樣辦不可。驅逐滿奴，打王和順，十萬民軍的遣散，廣東全省財政的整理，都是由先生主要計畫的。人但知先生當時不過做個總參議而已，那知先生的焦勞，先生的骨裏負責，實在比任何人都厲害。最奇的他也不過是個書生而已，也沒有看過兵書，而他對於兵事，不止懂而已，並且所計畫的都對。打王和順和收復虎門的軍事，完全由先生發命令的。當時並無參謀，惟有先生一人而已，連陳炯明也不懂甚麼。民國元年三四月間，廣東省有十多萬民軍，其中將近十萬是和先生接近的。他知道他如果不想法子，這些民軍是無從解散的。後來應裁的果然通通裁了。表面上他並沒有說甚麼話，但是事實上他不答應的，或是他不督促的，便無人能夠裁得動。裁兵以後，先生不做別事，一心去統一財政。如今廣東有許多很好的將士，大家功在黨國的，都是朱先生當日的小學生。當日先生曾經拉他們去軍事機關裏辦事，到先生統一財政的時候，忽然解散他們，另找一班精於會計者，組織審計處

，去嚴格考核都督府，經略處等機關的預算決算，絲毫不放鬆。雖多做了一面旗子的賬，他也會查察出來，對呈報的人駁回。先生並沒辦過學校，但是憑他的精明，連某學校內，某教員不上課而多兼薪水，都查勘得出，在呈報的冊子上批駁個痛快。所以有他在那裏審計全省的出納，弄得各機關都不敢亂來，全省的綱紀，就此肅然。

先生在辦事中，對於同等的朋友，無絲毫客氣，有時甚且大罵。但是對學生，對部下，却小心撫慰，好過家人。在廣陽時，早晨許多部下未曾起身，他常常走了去。說：『喂！好了！可以起來了。』招呼得很小心，所有對朋友的那副嚴厲樣子，一時會收拾乾淨，真是莫名其妙。凡是和他共過事的人，都曉得他這樣脾氣。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總理到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先生未即加入。大家那時因總理的勸導，願守綱紀，重行入黨；先生却爲了廣東的事，被派往港澳一帶，謀助西江同志起事。攪到岑春煊成立軍政府時，先生兩面受壓迫：一面受袁世凱的走狗龍濟光的壓迫，一面受軍政府的壓迫。先生用了很大的腦力，歷了許多的艱苦，一直支持到底，把事情辦好了，才離開那裏，而他終覺得未能盡達目的。離

開以後，便暫時讀書休息。他本來一直沒有休息的時候的，稍閑一點，便讀書，並且認真的讀，用研究態度去讀；這樣的讀書，就算是他的休息了。到了張勳復辟，段祺瑞解散國會，總理回到廣州，朱先生又十分努力起來；那時祇有他能夠跟着總理，完全替總理做革命的事業，我們常受他很大的責備。有許多地方，自然是各有所見不同了，但是也見得他對於朋友的忠實和嚴正。即如兄弟和汪精衛先生要把二十營粵軍收回，朱先生不以為然。一天，我們兩人正在和廣西人接洽一切，却因別的事情同到大元帥府去見總理。朱先生其時為府中的秘書長，看見我們，忽然說：『展堂和四舅（他喊精衛先生四舅）在北京住了數月，是否已染上了官氣？』我們當時駭然，覺得先生對於我們有不諒處。兄弟便說：『你是指那和廣西接洽的事情嗎？你看見結果以後，再下批評吧。我們也不是容易傳染官氣的人哦。』朱先生後來也自悔，說自己太過了。可是他心以為惡的，他毫不容忍的便攻擊，這是他為人的不可及處。他的嫉惡性和革命性，都高到極點。不過他的嫉惡，與尋常不同：有一種大家都以為可惡的，他有時却不理會；他所罵的惡，所攻擊的惡，一定是他以為大不了的。他有

時脾氣非常之好，他以為不相干的事，便不理會，不計較；有時又絕不留情的，當面責備起來。這是先生的矛盾性，也就是先生嫉惡的特殊情形。

後來軍政府攪成總裁制，總理不以為然，粵軍回粵，局面改變，陳炯明在漳州不動，不是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逼他，他簡直終於不動了。總理要陳炯明去驅逐掉軍閥，軍事計畫都出於蔣先生；朱先生也不顧一切的只管督促了做。鄧澤如許汝為諸同志也從旁鼓動，陳炯明然後才決心去幹。其時朱先生不願隨同出發，而獨自赴港，另作活動。陳炯明在潮汕原甚得手，一到河源，便沒有進步了。過了數週，仍無進展，因為陳炯明的兵力，實在不及廣西人的三分之一。這時候朱先生恐怕陳炯明不支，非別有舉動，以資響應，不足以挽回局勢，因即運動虎門砲臺反正。不料即此一舉，先生便成了仁了！其時砲臺降軍，與一部分鄧某同志所轄的軍隊衝突起來。降軍說非先生來不能決，鄧同志方面也是這樣說。先生於是不顧一切，單身獨往，毫無護衛。到了那裏，正對臺兵加以曉諭時，臺兵忽然圍攻先生。先生退出，到了半路上，又被圍住。及至已經受傷，坐在地下，揚起手來說：『我乃朱執信。』而開

館的人仍舊開館，先生就此殉國了。事後雖逮捕了許多人，究竟主使者是誰，是莫榮新一派呢？還是別人？始終未攪清楚。先生在漳州督促陳炯明時，原末期事之必成；他寫信給我和戴季陶先生，（其時我們辦建設雜誌，先生原也是雜誌的主幹，却先離開了。）信上說：『你兩個是否可以就隱在湖州呢？』語雋而義嚴。兄弟當時就趕快出來，到了上海，已得着先生的凶信，大家真是傷心極了！

論到先生的文章，不必說，是有一種獨到的地位的。第一思想最不肯將就一點點，絕不隨便以人的道理爲道理；一空倚傍，自己向前去幹，先生做學問，做文章，都是如此。先生讀書之量甚多，做起文章來極快，精神一集中，千萬言一揮而就。曾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隔壁，租過一所小房子，夫人而外，還有三四個小孩，合居一樓一底。先生做文章時，常常有一個孩子牽着手，一個孩子抱着腳，一個孩子坐在膝上。案上書籍亂疊，先生在亂書叢中，孩子隊中，看書，思想，作文；又快，又認真，從來沒有一文一字的草率，寫字筆筆透到紙背。那種精神。真非常人所及！先生的文學，只有詞章一派的所存不多，此外關於學術的

，關於思想的，關於革命的，關於社會的文字，都經收集起來了。尤其是表示革命意義的著作，搜羅已備。

對於先生的評贊，自然以上面所述，總理及吳戴汪諸先生所說的爲有價值。兄弟個人，在評贊以外。對於朱先生，還有一點小意思。就是大家每每說朱先生可以學，或者說朱先生不能學。其實我們要完全學到朱先生那樣是不可能的，因爲先生有先生的特性，自信力最堅強，任事最勇，進德最猛，立品最崇高，最純潔，實在學不到。但是要說完全學不到，也不見得，因爲先生的革命工作，不止改革社會，尤其是勇於改革自己。自信力雖極強，同時如果覺察到自己的不是，力予革除，毫不猶豫；許多個人的習慣，先生革除得極勇猛，上面已經說過例子了。我們要學先生，應該學先生的自強不息，以意志來率領血氣。先生曾經也有過這樣一句話：『追悼死者，不必徒羨死者，祇想怎樣去學他，和繼續他的志業好了。』我們今日追悼先生，正好遵守先生這句話，應該知道怎樣去學先生，去學先生甚麼。我們要把先生勇於自革的一種精神，普遍到一般的同志，未來的青年的身上去，這就是我們今日追悼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 第四集

先生以後，應知的道理，和應盡的責任了。

中央黨部第三十四次總理紀念週演講

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各國革命黨的大略——土爾其的黨軍隊化與軍隊黨化——黨如何能軍隊化——本黨的紀律應從那裏生出來——土爾其對於宣傳的特別見解——所謂老同志是那種人——新與舊的真意義——拿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做標語是最新的——遵守 總理的遺囑去做『聯合』『共同』的工夫——『務須依照』 總理遺囑去做不要自作主張——去普遍主義的宣傳不要向少數人爭論——要把個人所有的力量交到黨裏來——勿妄自尊大亦勿妄自菲薄

今天中央黨部舉行 總理紀念週，兄弟回國以後，第一次參加，可以先將此次考察歐亞各國的政治情形，作簡短的報告，然後再供獻一點其他的意見。

兄弟是今年一月出國的。出國之前，兄弟和幾位同志抱了一個志願，認定我們國民革命軍一定能夠於最短時期完成北伐的，而我們就覺得應該分擔一部分責任，在北伐工作進展當

中，到國外去宣傳。同時中央適有命令，要我們考察各國的經濟和政治情形，尤其要注重那些經過國民革命而新興起來的國家，綜合所得，以爲我們北伐完成之後，訓政時期一切建設事業的參考。我們出國以後，經過的地方太多，要把考察所得的全部，儘今天來報告，是時間所不許的，所以現在只將一部分報告出來，供大家的參攷。

我們要知道本黨並不是普通的政黨，是一個革命黨。所以各國許多普通政黨的情形，是不足作我們參考的重要材料的。但是兄弟覺得，如果除開主義異同的問題來說，凡是有革命性的政黨，也都有供我們參考的價值。我們此番出去，對於英法各國的政黨，雖曾有所考察，但終覺得於我們沒有多大關係，現在不必去說他。只有俄國波希維克黨是革命的政黨，其次土爾其的國民黨也是革命的政黨，這兩個黨是值得我們注意參考的。原來俄國的共產黨是効法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可以說是社會民主黨的兒子；而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黨又脫胎於俄國的共產黨，不過兩下的環境與人才都不同，結果也就不同；但是他們這幾個黨的線索是顯然可尋的。至於土爾其的國民黨，却是另外一個系統。因爲土爾其在歐戰前後，經過了許多

壓迫，統統是造成她的革命政黨的機會。

對於土爾其國民黨的內容，一時不暇多述，只就她精神所表現的地方舉一二點來說說吧。兄弟曉得蔣介石同志最近有兩句話說：『軍隊「黨化」。黨「軍隊化」』。這兩句話本來是我們從前在廣東時常常談到的，其內容確是含有至理。我們從前雖這樣說，一直還沒有能做到。這次我們在土爾其却看到她把『軍隊黨化，黨軍隊化』這兩句話做出很好的成績來了。我們先要曉得土爾其也是以黨治國的。她現在並且真實做到了『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已經是非常統一整齊，嚴肅活動的一個國家了。當她從事國民革命時，她是先做到了軍隊「黨化」，其次又做到了黨「軍隊化」，然後才有這樣的結果。軍隊怎樣黨化呢？軍隊最怕的是沒有國軍的性質，不服從命令，不能表現一個統一的意志，變成許多各不相謀的烏合之衆，甚且變爲人人自相殘殺的亂民。再乾脆點講：軍隊若不黨化，可以成爲軍閥。土爾其的軍隊力量，在革命初期是不甚強大的；但她却無割據的毛病，而完全是整個黨的精神結晶起來的。那時各軍軍需已經統一到陸軍部，後來更統一到財政部，由財政部更統一到國會。譬如各軍的軍費預

算，要先送交財政部，經過財政部送交國會；經過國會的審查核定，然後成爲法案。法案既立，則各軍費用，皆經財政部所派司庫員簽字照發；如有不合於預算案的款項，則財政部司庫員概不簽字，便沒處領取。上自軍長下至士兵，所有一切費用，都照此預算，照此辦法而行，無有違犯。至於政府各部地方各機關，也都有確定的預算，都是一樣的辦法。所以土爾其的國會是統一全國的機關，一切政策及預算案，都由國會決定。國會所討論的法案，又是由黨預先決定的。如果國會有不依從黨的意思的時候，黨可以召國會議員來開會，命令他們要通過黨的政策，使之成爲法律。這又是她黨「軍隊化」的情形，同時也真可算得是以黨治國了。再從別方面說，土爾其國民黨的軍隊化猶不僅此而已：在她國民革命未成功以前，她的黨對於黨員是重質不重量的。所謂重質，就是注重黨員的行爲，歷史，及對於主義政策的明瞭，對於黨的工作的努力。至於在政治機關做事的人，她都叫他們是當然黨員。我們起初聽到此點，以爲和她黨員重質不重量的主張矛盾了。那曉得她並不矛盾，因爲這句話的內容是：凡服務國家的官吏，既然可以做黨政府的官員，當然就是黨員。而且這些黨員，只有黨員

的義務，而無黨員的權利。他們雖然入黨，但不能干涉黨內的事，也無黨內的選舉權；若是做錯了事，却要受黨裏嚴格的制裁。人家或許以為這種辦法很像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那樣專制，其實不然：法西斯蒂的黨是操在一人手裏的，所以十分專制；土爾其沒有個人專制的現象，這固然由於她的民族性裏比較有服從的精神，也是因為她整個黨的命令能夠統一全國，能夠令出惟行。譬如土爾其的男子，素來帶着一頂紅帽子，土爾其政府認定這種習慣是要改革的，就下令說：二十四小時以內，一律廢除全國男子頭上的紅帽。而令出之後，二十四小時內，果然全國沒有戴紅帽子的男子了。還有土爾其的女子向來面上蒙着黑紗，這是古時或因為處在沙漠地方的緣故，才有這個習慣，後來就由習慣變成迷信，再由迷信變成一種禮教。但是土爾其政府革新的命令一下，全國女子的黑幕便通通揭開。再就調查戶口來說，我們若問中國人口有多少？幾十年前就說是四萬萬人，至今仍舊說是四萬萬。那有中國人口老是這樣不變的道理呢？難道幾十年來，一個不會多，一個也不會少麼？老實一句話，就是我們從沒有確實去調查過戶口，不知道隨時的實數罷了。因為調查戶口一事，在不明白的人民以為

是政府想抽人頭稅，人人都要起反對，弄到你調查不成爲止。但是士爾其的調查戶口，只要政府下令，在二十四小時內，全國人民不准出門，就把全國的人口通通調查清楚了。像這樣一種軍隊化的方法，現在中國全國辦得到麼？一省辦得到麼？小而言之，一縣辦得到麼？我們所以辦不到的，不是爲了別的，就因爲我們的黨還沒有軍隊化的緣故。

我們現在要問：黨如何能軍隊化呢？兄弟以爲對於其中的道理最看得清楚的，莫過於蔣介石同志了。他說黨要軍隊化。第一要意志統一，第二要權限分明。軍隊意志不統一，軍官各有各的意志，沒有打仗，先就亂了，那還能夠說是軍隊麼？軍隊的權限不分明，團長來侵越軍長的管理，旅長來侵越連長的職務，這樣的軍隊，當然也非至於紊亂不可。軍隊的效用一是保護人民，一是對付敵人；黨也是一面保護人民，一面對付敵人。黨要能做到這種地步，必定要有紀律。我們固不必引蘇俄共產黨的一切口頭禪來推崇紀律，因爲他們那種機械式的紀律，我們實在不敢恭維。但是黨內總應有紀律，我們也不能鑒於蘇俄共產黨的方法不對便根本忽略了紀律。我們要把黨辦得好，機械式的紀律誠然是不可特的；如要紀律不是機械

式，就非求黨員的意志統一，和權限分明不可。總理嘗說：『人民有自由，黨員無自由。』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如果黨要有紀律，黨員的自由便要受嚴格的限制。我們在中華革命黨的時候，人人是要發誓，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財產去革命的。生命財產尚且須犧牲，還說甚麼自由呢？自然也都要犧牲了。所以黨員要在統一的黨的意志之下，去求整個黨的自由，決不可妄說自己的自由，來破壞黨的自由。總理嘗說：『中國因為自由太發達了，所以不能再講自由。』他雖然沒有說黨，「軍隊化」的一句話，而他的意義却完全就是如此。我們一面要黨有紀律，一面還要全黨的黨員互相融和。總理給黃浦軍校以『親愛精誠』四個字，就是要黨員不散漫，同時却又不想像蘇俄共產黨那樣機械式的行動。本黨的紀律是應從總理『親愛精誠』四個字裏發出來，這種紀律纔有真正一貫的精神。我們由總理遺教所指示而來的革命，所以高過其他國家一切革命的，就是由於依本了這種『親愛精誠』的觀念，產生了一個親愛精誠的中國國民黨的團結，這層意思，實在是我們同志所不可不知的啊。土爾其的革命，就她的社會和國家，乃至民族精神，各方面看來，都是超過意大利的。但是我們看她還是不夠

。爲什麼呢？因爲她的革命只可說是一民主義。她革命革到現在，仍舊沒有領導民權的方法，更沒有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但是我們對於她的軍隊「黨化」，黨「軍隊化」，却不能不有相當的佩服。她還有二點值得注意的，就是她的宣傳方法特別。土爾其人說：宣傳要在平實上着手，不是在開會貼標語上用功。倘若只有開會遊行的一套，千篇一律的做法，那只有弄到人民厭棄爲止，絕生不出什麼良好影響來的。最重要的宣傳方法只是『令出必行，行必有効』，這才是落到實際的呢。這些話實在不錯。像我們以前的宣傳，只有口頭式文字的宣傳而已，事實却無一點，如何能行呢？要知宣傳正爲事實而宣傳的，若是隨意空談，不問事實，其結果甚且變成反宣傳。兄弟看見現在南京各地牆上的標語，比去年乾淨些了，有些意思了，心裏很覺安慰。

不過從目前的宣傳情形看來，黨員對於所謂新舊的問題，還有些不清楚的地方。現在不妨就這個新舊的問題詳細談一談。大家平時說某人是新的，某人是舊的，每每失當。原來與新舊同時成問題的，還有一個真假。我們所要的不但是所謂新，而且要是真新；至於假的可

就要趕緊排除，萬不能上他的當了。俄國東方勞働大學裏曾經有過一句口號：「擁護老同志。」他們的解釋並不是因為老同志的年齡大而擁護他們，是因為凡屬老同志，他們在革命過程中經過長時期的犧牲和奮鬥，他的歷史，和他的經驗，不是尋常代價得來的所以擁護他們；否則他們雖「老」，而已經不是「同志」，更何從說「擁護」呢？這種解釋是對的。如本黨黨員中有經過許多困難而始終不變的人，這種同志，愈老就愈難得，豈有因為他年老而便不予擁護的道理呢？凡是同志都應該自己檢查自己一番，究竟能不能始終為黨奮鬥，為主義奮鬥，二十年三十年如一日？不是看錯了「老同志」三個字的意義，大家做同志，反而不願意長久做到老的，那實在是笑話！莫斯科的報紙上曾經說兄弟是世界革命者的新派，也有人說過兄弟是舊派，兄弟都承認。不過所謂新舊，究竟真假如何，我們要從事實上去判斷，不是憑他人口頭的咬定，或本人自己嘴上的誇張，便能確定的。嘴上天天說自己是新的，而事實上終做不出一點新的來，那就算是新了嗎？假設我們說我們的飛機可以飛離天空，或是說我們的潛艇可以潛入地心，但是事實上能做到嗎？不能做到，徒然說得新奇炫人，又有何益呢？如果

確有新研究，新辦法，新條理，真的有整個的新表現出來，然後再鼓吹自己是新不遲。譬如將階級鬭爭，無產階級專政等語，拿來作宣傳標語，滿街貼起來，就算得是新了麼？這些話早經事實證明不適用的，做不通的，舊得沒處再舊了。真新的是要適合現代的需要。如果衝得離開時代事實過遠，那是要退回來，退到事實上滿做得通，正用得着的地位。才稱得起是新的呢。俄國的新經濟政策是做得通，正合用的，所以以前做不通的不得謂之新，而現在的這個政策可以謂之新了。所謂新經濟政策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可以使全國的人民永不至於餓死，永不至於流離失所。這種辦法，俄國人以前看不到，定要走那不通之路，而我們總理的主義和政策之中却早已看到了，早已有了具體的辦法了，足見我們的～一直是新的。凡是這些做得通，正適用的辦法，總理的博大的主義和政策之中可算通通有着，在我們看來，原有甚麼新奇可炫？從他方面說，我們如果儘拿總理的主義和政策來做標語，那才是真新的，最新的呢。不然，既不適用，又行不通，且無實現的可能，和飛機破空，潛艇入地一樣，妄而已矣，何新之有？總之，我們談理論要不忘事實，同時要因事實而生出理論來。事實與

理論能夠互相照應的。才是真理，其中才有所謂眞新的在着。大家同志以後千萬不要丟開事實，一味驚奇羨異，結果是徒然上人家的惡當。兄弟此番回到上海時，有個朋友問道：『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兩句話不太過干涉黨人的自由麼？』兄弟回說：大家如果貪圖自由，還是不必入黨的好；既然入黨以後，一切當然以主義爲範圍，便不能自由了。平常人說：『自由無限，以法律爲限。』我們可以說：『自由無限，以主義爲限。』未入黨的人，對於一切主義，都可以抱研究態度，任意取舍；既入黨後，便無個人意志的自由，主義以外，不能再有主義，所以本黨以外，亦不能再有黨。至於黨內無派一層，本黨本來無派，因爲共產黨到處替人家分家，他們以前進了本黨，也大用這個策略，本黨便大受其害，而攪出派來了。我們看總理遺囑上所說，只有『聯合』『共同』等字樣，而共產黨偏來做反面的文章，拚命的將本黨分化。好像一家之中，分父親爲左派，兒子爲右派；丈夫爲左派，妻子爲右派。直到現在，本黨清黨的工作雖繼續不斷，而許多不很明白的同志，還受着他們從前分化的影響，常常鬧甚麼派別。所以本黨以內，絕對不許有派，這句口號也是十分緊要的。

這裏兄弟還有一點意思供獻大家：我們再看 總理遺囑上所說，是教我們『務須依照』怎樣，並沒有允許我們一切自作主張。我們去年出國時，有人勸兄弟將三民主義再多多加以解釋，兄弟說這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不過 總理的主義實在明白得很，不是甚麼艱深晦澁的文字需要解釋的。在未入黨以前，我們心中沒有惟一信仰的主義，我們需要研究個清楚，認識個確當，我們的理智和良心，不容有半點盲從和虛假。這是『爲什麼要做』的一句話的答案。既入黨以後，已經有了惟一信仰的主義，主義如何又是明明白白的，那我們只有趕緊依照着去努力，便是『怎樣去做』的一句話，好像出兵打仗一樣，軍隊既已開拔以後，只有說趕緊怎樣去打，再沒有研究爲甚麼要去打的餘地了。並且在趕緊怎樣做之中，總要有個『自己趕緊怎樣做』。到了現在建設時代，無論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的人，都應該趕緊去做。只怕大家推諉不做，不怕沒有事做。總理曾經說過：『亂做亂着。』意思是說：亂做還比束手不做的好。的確，在革命進程之中，每每遇着十分艱危，十分繁亂的時候，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的事實在不少，黨員在 總理指導之下，有時亂做也會做出頭緒來。現在既已不是

十分艱危繁亂的日子，一切訓政建設的事情，總理已運用他的理智，一步一步的定好了，凡事大家可以『依照着做』，而且無須勉強『亂做』了，大家還不切實的去，還要說甚麼空話？總理已有明白的使命給我們，教我們創造新中國，最低限度也要使中國在國際上得到平等的地位。好了，我們今後便向着這個目的去做吧。

至於說到言論自由一層，無論何地何時，總要有限制的。言論自由的國家，莫過於英美了，但是當歐戰時，有反對宣戰的即下獄，可見絕對的言論自由，是任何政治情形之下所不能有的。批評要有批評的態度，不能隨便謾罵，謾罵的態度是不對的。朋友間的批評，只是忠告而已，更無其他；不然，便不免別有作用了。而且批評人家的辦事不當，或某種制度的不良，都要着重在事情或制度上。除掉理論而外，自己總還要有自己的方案，自己的辦法，自己所謂當的，所謂良的，說出來給人聽，才合批評的態度和作用。又如我們看見一個路人，隨便說他是病了，及至見了醫生，又說他沒有病，如此不負責任的妄加指謫，當然更不對了。凡是同志對於黨內的重要問題，要互相討論，用不着謾罵。有背紀律的，不合分際的，

尤不應當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不但同志間應該如此，就是對於同情於本黨的人，對於一切的人，都應該如此。並且我們時時要檢查自己的短處，永遠不要以派別自居，同時以派別疑忌人，中傷人。關於甲問題的，不要牽扯到乙問題上去。要知道我們最高的理論是在主義的宣傳普遍，而不在對少數人的爭論勝利。兄弟向來只想在黨內做一分事情，不想在黨內樹一分勢力。願和各同志把個人所有的力量交到黨裏來。不願將黨裏任何一點一分的力量抓出黨去。現在有兩句話是我們應取的態度：我們一面不要妄自尊大，一面也不要妄自菲薄。今後大家只管在這種態度之下，依照 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努力做下去，以求主義的實現，主張的貫徹好了。敢即以此義與諸位同志永遠互勉。

中央黨部第三十七次總理紀念週演講辭

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大法的完成，全賴遵循 總理的遺教，大家對於 總理的信仰，應該益深——

——答復各同志對於制定國府組織法時所供的意見。——國民政府委員加推張委員學良的意見及經過。——黨應該如何去做人民的喉舌？——中央和各級黨部

同志的兩種毛病。——腐化足以銷蝕革命性的危險。——建設時代尤其要慎防腐化！——大家應該自省：究竟有無革命性，是否保持着平民化的生活。

各位同志：最近過去的一週中，中央已經頒布了訓政綱領，國民政府組織法，和五院組織法；並且連國民政府的委員，五院院長，也通通產生，宣誓就職了。這實在是全國統一以後，由軍政時期遞到訓政時期的一個極重大的表示！本黨既遵守 總理的遺教，去建設中華民國，當此訓政開始，自然不能不趕緊頒布一種根本大法，以為建設上一切措施的原動力。而訓政時期，黨與政府，黨與國民，政府與國民，彼此間的關係如何，以及政府治權的所由

來，治權的如何行使等，尤不可不早予確定，昭示全國。最近過去一週中，所頒布的訓政綱領，國民政府和五院的組織法，正是應合這種要求而制定的。所以我們既有了這些，可算我們建國的工程中，重大的規模已具，以後各方面進行，便不怕沒有頭緒了，這是何等可以慶幸的一件事呢！自從兄弟在海外時，與少數同志，提出這一個議案以來，先經過了第五次中央全會的討論與通過；最近又經中央常務會議，中央政治會議，疊次的極鄭重的討論，審查，修改，然後才從訓政綱領起，直到各院的組織法止，整個的確定下來。統覽全功，雖不敢自信爲如何敏捷，可是和舉世各國開國大法的成立比較起來，總算困難最少，而進行最順的了。何以故呢？難道因爲我們的才力超卓過人，所以能夠如此速成大業，而又條理昭然的嗎？實在因爲我們的工作，不是憑空的創造，而完全有 總理的主義，政策，方略，在那裏給我們遵循着，我們不過一步一趨而已。假如我們沒有 總理的建國大綱等等，或有而我們不去遵循，這訓政開始時一段成立根本大法的工作，誰能做得那樣順利而且周到呢？而且我們新創的規模制度，現在已經惹起了各國政治家的注意，加以研究了；這種規模制度，將來不

但是我國民福利的淵源，並且足以爲舉世人羣羣治的楷則，功能之遠，誠何可量！這是在慶幸之餘，對於總理，應該更加深切我們的信仰與感戴的啊！

中央同志對於前項綱領組織法等正在討論的時候，接着各方面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許多意見。其中有一部分，中央是認爲同意，正在致力商榷中的；有一部分却覺得是各方面同志的誤解，不能容納。中央於此，俱未曾一一分別答復，頗以爲憾。現在大法既已頒布，各方面同志，尤其是前曾具有意見的同志，就其條文與精神之所表現的，應該已有相當的認識，對於自己的意見，也應該和他印證過一番，那麼這就算中央對於各同志的總答復，不必再有形式的，瑣屑的，分頭的答復了。兄弟現在再把各方面同志最多注意的兩點提出來，趁此機會，口頭解釋一下：第一，有許多同志曾經探問，如今要不要有約法？假如要約法，究竟要那一種的？仍舊用民二民三之間的約法呢？還是照總理的建國方略，與國民重訂新約法呢？約法內容如何？又應當如何定法呢？現在中央既已頒布了訓政綱領與各種組織法，中央認爲目前所需要的，究竟是約法不是約法，不是約法而是甚麼，可算已十分明白，毋庸再有

贅辭。不過大家應該知道的，訓政時期最要將黨，國民，政府，三方面的關係，地位，攪清楚。至於法，事實上所需要的，乃所謂約法或憲法中最要緊的一部分，政府組織法。我們正不必捨掉這最要緊的一部分大法，而去很迂闊的馬上求一部整個的甚麼約法。何況如民二二三之間的約法，總理當時本不贊成呢？第二，又有許多同志以為現在是訓政時期，不能違行五權制度，有躐等之嫌。其實現在的五院，與將來憲政時期的正式五院不同。現在不過仿照總理所定五權的意思，試行五院的辦法，為將來成立正式五院的預備，打個基礎罷了。至於五院的同時成立，抑先後成立，格外是事實問題，於理論無關。五中全會議決五院逐漸成立，是顧全的事實，並不含有何種理論在內。如果說五權的意義，憲政時期去應用便對，現在去應用便不對，五院的成立，分期便對，同時便不對，訓政時期仿照總理五權的意義，早點立下五院的規模，便不合理論，那就誤解了。現在各院組織法既已頒布，大家應該認識訓政時期的所謂五院，究竟是個甚麼樣子。是完全就訓政時期事實上的需要，縱裏面與國民政府，政治會議，具有統屬關係的，橫裏面五院相互間又具有連鎖關係的。現在的五院，

並不能單獨運用其權力，有如 總理所定，應合憲政時期所需要的五院，大家對於這一點，是應該注意的。

關於國民政府委員的任命，還有一件事應該報告一下。國民政府委員的名單，初由中央常會提出，交政治會議討論。這層手續是很正當的。因為訓政綱領和最高治權，統統由黨制定，由黨授予的，至於執行治權的人，當然也由黨任命，毫無疑義了。又因為治權的授予，已在訓政綱領和國民政府組織法的前文裏面定明，所以執行治權的人的產生，便不必更有明文規定了。這一層也有許多人懷疑過，所以現在特地說明一下。中央所提的國民政府委員，除主席外，原設有十五人；後來又加入張委員學良，便一共有十六人了。加推張委員一層，曾經過長時間的討論，覺得確有加推的必要，然後才決定加推。這其中的理由，尤以蔣介石同志所主張的為清楚。蔣同志看到中華民國現在已經是整個的了。東三省乃中華民國的領土，並非國際間特別的地方。過去的一切，追求無益，便不必追求。目前張委員對於中央，已經一再輸誠，實在因為有困難，所以形式上難於有所表示。中央為顧全統一，為使當事人

不能再有所規避躲閃，爲給國際上一個明白的表示，不能不馬上把東三省看得和其他各省一樣，以公正的態度，統一的精神，加推張委員入國民政府。中央常會的意見決定了以後，當日下午便提出政治會議。在政治會議裏，又有人懷疑：張委員是否同志？張委員對於中央，目前形式上固然不夠，但是精神上是否已夠？有許多爲黨國努力多年，勞苦功高，政治上的資望能力，俱屬不弱，足爲國府委員的人，皆未經加推，而獨加推張委員，似乎說不過去。應該鄭重從事，嚴格考求，以表現國府委員的地位如何重要，人選如何精確，然後政府的威信才能彰著。又有人主張張委員雖可加推，但宜先令其形式上有所表示，然後在中央方面，庶幾有辭可藉。如此討論又幾小時，不能決定。後來譚主席說：加推張委員，在中央常會中原是蔣同志的主張；以前關於東三省的軍事，也由蔣同志負責辦理的；以後張委員的派人輸誠，以及中央的懷柔招撫，通通責成蔣同志去辦的。現在對於這個問題，惟有多多注意蔣同志的意見，來求解決。其時蔣同志未曾出席，立刻用電話請蔣同志來，再繼續討論。蔣同志來了以後，說的話比在中央常會中所說的更清楚了。他大致說：這件事的意義，不僅對內，

而且對外，乃統一之中所必須有的。人的問題尙在其次，最要緊的是地方問題。我們要問：統一的中華民國中，究竟包含不包含東三省的地方在內？如果要使國際上承認我們確已統一，要使某國少一些藉口，要使東三省的當局無觀望的心思，迴旋的餘地，只有如此決定去做。一般同志，見不及此，暫時的不諒不滿，是一定難免的。但是這件事的關係很大，久後一般同志對於事情的本身如果明白了，對於我們目前的如此決議，一定也會諒解的。如果東三省方面並非真正覺悟，到了必要的時候，中央自有正當的態度表示，絕非沒有主張的。並且現在只該問這件事應不應當實現：如果應當實現的，中央自有中央的權衡，逕自決定去做好了；如果不應當，便決定不做，不必猶豫狐疑，更不必打電報去徵詢意見，作種種的先容，中央惟有取至公至誠的態度而已。蔣同志如此說明以後，大家完全諒解，此案才決議通過。這是那天決議的實在情形，特地報告一下。

但是上海市黨部所屬的某某區黨部，對於中央決定此事，有了意見，忽然在報紙上發表起來了，從黨的紀律上說，實在令人詫異得很。區黨部有意見，應該先呈報市黨部，市黨

部就應該體會中央的意旨，加以宣導。如果市黨部也不明中央意旨所在，應就區黨部所呈，附加意見，請問中央。乃意見並不先到中央，更不管中央的意見如何，就冒冒失失的將自己的意思向黨外發表起來了，這樣看來，黨內究竟有紀律沒有紀律呢？凡不在紀律之中的工作，一定是要錯的；凡不守紀律的人，一定不曉得甚麼是他應做的工作的。像這樣妄發意見，那就又中了兄弟前次所說的兩句話，太忠於報館，太不忠於黨國了。像這樣的工作，能夠算得是黨的工作，是為黨的工作，是黨員應做的工作嗎？有人說：報紙乃人民的喉舌，本黨也是人民的喉舌，黨部的意見，登在報紙上，不是應該的嗎？殊不知黨要整個的去做人民的喉舌，各級黨部何能單獨自己代表整個的黨？黨員要恪守紀律，然後整個的黨才能實現，如果漫無統系，漫無紀綱，一個黨裏生出許多喉舌來對外，一定弄到人民無所適從為止。人民看見我們中央一個意思，市黨部又一個意思，區黨部又一個意思，一定要說：『你們遇事自己家裏還沒有攪清楚，如何便向我們發表呢？你們有這許多喉舌對外說話，我們雖有意見，究竟託你們的那一副喉舌去說的好？』何況在黨言黨，既做黨員，一切的自由，都不及一般人

民的多，那有根據了言論自由權來隨便發表意見的道理呢！

兄弟感覺本黨同志中，現在有兩種毛病：一種是在中央的同志，每每忙了小事情，忘却了大事情；一種是在各級黨部的同志，每每忙在許多空談，而忘却了實際的工作。先說中央的同志，如兄弟就是一個。兄弟現在覺得生活方面，和去年在南京時的情形差不多了，終日忙於四會，四會以外，不能更做一點實事。所謂四會，乃會議，會客，演講會，宴會。他如起草會，審查會等，已經包含在第一種會議中，不必另舉了。去年在南京時，有人問兄弟生活如何，兄弟祇能舉此四會以對，而近來又復如此了。四會之中，以宴會比較可以謝却或減少；以會客一項比較最為麻煩困難。現在的會客，與從前官場中的會客不同，沒有端茶送客的一條規矩了。中國人會客，又不比外國人：定了時間也不能勉強客人遵守；談話時更不能限定幾分鐘；派代表見總歸不滿意。尤其是同志來見，當然要當面晤對，聽其盡言而去了；可是同志太多，若人人盡言而去，便是個不了！俄國的史丹林曾經對兄弟說過：有許多同志掛號掛了三個月，還沒有會見他的面。我們對於同志，如何能如此呢？又往往一室之中，有

許多起客人，一見面先開口的一位，如果是個健談的，滔滔不斷，那其餘諸人中，雖有先到的，雖有要緊的事物的，反而一齊隔開。又往往此會應付未清，而別會時間已到，只好對許多人說一聲對不起，改日再會。至於會議一項，乃平日工作的第一大宗，每天常要坐在那裏八小時，十小時。坐的久了，身體完全像個機械，腦筋裏面的靈氣也減少了。心與身都跟着形式環境去動，有時甚且盲動起來。遇着重大的事，而沒有清明的腦筋去思考，去分析，沒有充分的精神去應付，去處理，那就誤事不淺了。兄弟每天早晨五點鐘起來，以半小時整潔身體；然後坐下來，把已經摘要的百十封信，擇要看幾十封。批答幾句；再擇最要的，親自復幾封，至早已到七點鐘了。然後便開始上面所說的四會，一直會到晚上八九點鐘，才有空看看報紙，把會議前後的起草審查等手續料理，最早要到十一點鐘才能睡。如果有同志來商量事情，弄到一兩點鐘才睡，也說不定。兄弟乃中央的常務委員，而終日的精力，便如此消費過去，不能專為中央更多做一點工作了。所以兄弟自己評論起自己來，此心究竟忠不忠於黨，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至於此身，却已經可以說是不忠於黨了。長此以往，如何是

好！四會之中，既然宴會可以減少，演講會比較不多，最耗精力時力的莫過於會客與會議，那麼今後總得設法把會客的章程訂好，務求晤對之間，彼此說話都簡要而有條理，於最短時間內，會到多數的人，交換了多量的意見；更要設法把會議中的報告和討論等，重複舉行的合併起來，節外生枝的刪削掉，節省下精力來，充分的用在重要的必須的議案上，有餘再爲黨多做一點更大的工作。這不但兄弟應該如此，恐怕凡是中央的同志，都宜如此呢。

再說各級黨部同志的毛病。前天有幾位同志談起來，說現在各級黨部的同志，應做的工作向下做不通，他們就另找出路，轉而向上拱。細想起來，這一層也難怪他們。因爲中央有時僅責成各級黨部去做工作而並沒有替他們定出怎樣做的詳細方案來。有時他們雖把工作帶到民間去，但是所帶的工作，不合黨義，或非黨的要求，又覺得中央對於那部分的工作，沒有先給他們以原則。所以他們在工作中，便覺得缺少方案，苦無辦法。向下做不通，只好轉過來向上拱了。他們可以對中央說：『那些事你們先有辦法，我們才有辦法；你們先有主張，我們才有主張』。這是第一層不能怪他們的。第二層，中央和省市黨部之間，除掉死的公

文式的文字來往外，很少當面交換意見。共同解決事情的機會。中央雖有意旨，有時事實上來不及宣示，或用文字總說不好的，各級黨部只好自以為是的盲動了，這也難怪他們。即以最近國府加推張學良委員一事而論，加推的意義，事前固然無從發表，事後也沒有甚麼解釋；同志中真能體會得到的，除掉參與中央常會和政治會議的少數同志外，其餘京內京外的多數同志，都無從曉得；而事實的表面，果然來得奇特，如何能教各級黨部的同志心裏不懷疑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各級黨部向上拱，向中央質疑，原是難怪的。不過不應該不負責任的，以便發表意見為時髦，不向黨中說話，而轉向黨外說話，那可實在不對了。要糾正這類毛病，兄弟以為一方面黨內嚴明紀律，各級黨部至少要認識黨內各部分的系統，對外要歸負責任者講話；一方面中央同志要設法到各省黨部去察看黨務，多多的與各級黨部接近溝通，隨時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方案與原則。如此以後，大家真個都去做訓政時期的工作，切實把民衆訓練起來，趕將一切向前推進，直到憲政時期為止，關於民生方面的建設，現在尤其要趕快確立基礎，向前猛進。凡此都是各級黨部的重要工作，重要責任。大家如果不恪守紀律，

不注重實際，那就一切進行，都適得其反。我們要自己猛省才是！

最後再提出腐化問題來，供獻大家一點意見。近來俄國共產黨發覺黨裏面也染了官僚化了，很爲恐慌，正在那裏設法遏止。我們知道：凡百事情當初小患不防，終要成爲大禍的，辦黨又何能有異呢？官僚化乃腐化的一種。腐化的定義，原很難下。實在壞事情凡是逐漸的壞起來，由微而漸著，由隱而漸顯，慢慢的進展，教人一時不覺得他的壞，而對他總是忽略，他便在人的始終忽略之中，形成了他全部的壞，不是突然的壞起來，惹人注意，隨時會感覺到要加以撲滅的，那就是腐化，那就是腐化所以腐的態度。所以黨遇到腐化，也同樣會忽略，也同樣會給他潛滋暗長的機會，終成一種不可拔除的毛病，不可收拾的局面；雖然是革命黨，雖然本來是富有革命性的份子，遇到腐化，革命性也會完全被他腐蝕掉，而黨也就失其革命的作用了。細想起來，這是何等的危險啊！不過腐化對於革命，在革命的破壞時期裏，與建設時期裏，先後情形不同。從前許多先烈，努力於破壞革命的精神，真不可及，革命性也極強，但是他們腐化的舉動，每每與他們的革命性遞爲表現。有些沈湎於酒的先烈，一

杯在手，流連忘返，但是說聲革命了，酒杯子一丟，站起身來就幹。更有奇者，在革命工作的前後，好像一定非廢一下不可。平常祇覺得革命工作以後，容或因為辛苦太過，犧牲太大，要休息，要慰藉，用得着許多娛樂消遣的事情，至於革命工作以前，何以也非廢化一下不可的呢？原來人在閑居的時候，總容易做些不善的事，又豈但小人爲然！假設預定某月某日，或遇到某種機會，便舉行破壞革命，事前大家不免磨拳擦掌，凝神壹志的等候了；可是在機會未到之前，或是時日已經逼近，而究竟未到，不能妄動，其時大家的精神緊張過度，情感激發過度，幾乎不能自持；真感覺到要發洩而無可發洩時，便不得不找些閑事來對付一下，以舒生理上面的煩悶了。我們只要看黃克強先生的手扎裏，追述三月二十九日一役，諸先烈在事前的情形，便可以知道個大概。諸先烈中，有一部分平日是很講究個人心身的修養的，有一部分人却行爲極其浪漫，吃喝嫖賭，一類的廢化事情，也不能免。但是一旦大難既發，趨事的奮勇，赴義的壯烈，兩部分人，初無二致。因此事後大家評論起來，頗無定見：不知道凡是有志革命的人，究竟還是愛玩的好呢？還是不愛玩的好？其實凡具有革命性的人，

在破壞革命之中，愛不愛玩，關係還小，在這一時期，腐化的作用却奈何革命性不得的。如果祇愛玩而原無革命性的人，他在革命事業以外去玩，只有格外玩得好些，他何必定要從拚命之中，偶爾玩一下呢？所以凡是肯走進破壞革命圈子的人，雖然一時愛玩，畢竟有希望。至於建設革命的時期，可就大大的不然了。在建設革命中，第一用不着拚命，工作是要經過長時間以後才能有效驗的；第二拚命以外的革命性，有無和真假，都不容易看出。譬如真有革命性的人，到了建設時代，遇事也不能不審慎些，而絕對沒有革命性的腐化官僚，向來的態度，也就是持重而已，不會冒險奮鬥，兩下表面上沒有甚麼分別。因此偶爾的因循，會變做長期的腐化；明明是屬於腐化的，會變得不算腐化起來。而凡是在破壞期中，本來不愛玩的人，到這時也愛玩了；本來雖愛玩而同時又有革命性的人，到這時革命性也逐漸消失了；大家直到喪志失節，完全被腐化征服而後已。辛亥革命以後，本黨同志作如此結局的很多，說起來真是黨史上一件痛心的事！

況且在建設時代，腐化的機會比破壞時代尤其來得多。破壞時代黨是秘密的，黨是窮的

。自己一個人被官廳捉去了，不提是黨人，罪還可以設法從輕；一提出黨來，不但要連累別人，而且自己的罪名，也就此坐實了。做起工作來，只有自己貼許多錢到黨裏去，除工作所需的最小限度外，黨是絕沒有多錢給黨員的。從前有一位老同志，由日本回到上海，由上海回到四川，只領川資一百元，便以爲是鉅款了。現在倘若這樣辦，工作的人一定喊不夠。其實當時也何嘗便夠？不過當時做黨的工作，肯吃苦，肯犧牲罷了。兄弟從前爲了黨的使命，從香港到南洋，從新加坡到伊里，身邊的錢不夠定艙位，只好上船以後，在甲板上隨便那裏買一個鋪位。可是到了上岸時就吃大虧了：頭二等艙的客人不麻煩，像兄弟那樣睡甲板的朋友，一定要經過極嚴厲的檢查，量體重，驗高度，打手印，種種苛待。事前明知其不免，但是不能因爲怕吃這種苦，便向黨部裏支那定艙位的川資。在這種情形之下，心裏想腐化也無從腐起了。到了建設時代，可又大大的不然了：黨部公開，黨費擴大。像現在有一班誤解黨權高於一切的同志，那簡直以黨爲護符，到處提出黨來，用作自己的工具，去壓倒一切。更有人造出『吃黨』一個名詞來，說有一班同志倚黨爲生，猶如傳教師的吃教，前清當兵的吃

餉一樣。黨到了既可以吃，又可以用的時候，黨員的生活，便不知不覺的高到平民化以上去，比起我們從前在平民化以下的生活來，那就相差甚遠了。加上建設時期，許多建設事業都在黨員手裏，經手的錢也多了，不見可欲，其心不亂，既然常常與可欲者接近，操守稍稍不堅，涵養稍稍不夠，那就墮入腐坑，無以自拔了。所以破壞時代革命者那點臨時發洩生氣的腐化，不足為患，至於長久認真的腐化，又沒有那種機會；一到建設時代，革命者的腐化機會，特別比常人來得多，腐化的惡魔，便舍棄了常人，而偏偏認定着革命者的身子四面，包圍侵襲，無所不用其極了。

我們平常只知道共產黨惡化，沒有知道惡化的朋友也會腐化的。原來惡與腐本屬一家，同為罪惡，不過態度上面，有些不同：惡是急進的，腐是緩進的；硬一點是惡，軟一點就是腐；為陽則惡，為陰則腐罷了，惡化的人，一定腐化，腐化的人，一定惡化，原不足奇。共產黨員貪污枉法的地方，早就數說不盡了。像前清官僚剝削起人民的脂膏來，又要快，又要盡；心地狠處，手段辣時，既奪他人的財產，便不得不先奪他人的生命，更非惡化而何！大

家同志對於這個問題，只要注意兩點好了：第一，自問究竟有無革命性；第二，自問是否保持着平民化的生活。如果確有革命性，而生活又在平民化之中，那一定不至於腐化的。至於一時的好玩等等，有紀律在，不患不能防閑。而且我們看了從前許多先烈的好玩，總是在工作沒有到手的時候，足見我們只要不停的去工作，自然能把許多慾念排開的。學校裏學生如果沒有課上，一定睡覺游蕩而腐化了；一般青年，一般黨員，老沒有工作做，自然也就閑居爲不善而腐化起來了。青年把腐化惹上身以後，一時心裏雖然明白，無奈習慣已成，擺脫不易的，豈非自己便把自己糟踏掉了麼？再則任何人的行爲，影響所及，總不會僅限於自己而已；何況腐化一層，彼此間的薰染作用，尤其厲害呢！所以自己一經腐化，對社會就負了腐化的責任。各國刑法中連自殺都認爲有罪，也就是這個緣故。因爲自己乃社會的一份子，殺了自身，就是殺害了社會的一份子，如何沒有罪呢？凡我黨員，應該時時刻刻想到黨，想到自己乃黨的一份子。腐化了自己，就是腐化了黨的一份子，就是敗壞了黨，犯罪極大。現在國家，黨，和我們各個人自身，都遇着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也就是我們的很嚴重的時期

。各個人應該爲自己想，同時爲黨國，爲社會想，從人格上，從事實上，常常檢查自己，不要染上一分腐化，而努力於黨國所要求的工作，以謀所應得的福利，這就是兄弟今天說這番話的用意了。

中央黨部第三十八次總理紀念週報告辭 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滿清之亡，可說因爲太違反了三民主義。——今後大官不負責，不做事，便要重演前清幕與吏的弊病。——我們考試的意義——今後黨員工作的三個標準。

——中央告全國工人書完全根據的總理遺訓。——目前做民衆運動的一個大毛病，和他的兩個原因。——革命者要始終領導民衆，不能跟着少數民衆亂跑。

——俄國自家的情形，和第三國際的把戲。——歐洲各國實施社會主義的狀況，和俄國的覺悟。——革命先要革心，清黨先要清心。

各位同志：關於政治方面的情形，剛才已有戴季陶先生報告過了。兄弟現在就戴先生所說的，再來補充一點。戴先生對於滿清吏治蠹敗的原故，分析得已十分清楚。不過兄弟覺得滿清一切制度的不好，政府所以傾覆，總原因不在別的，可說就在太違反 總理的三民主義了。這句話看上去似甚膚闕，其實細想起來是很切當，並且隨時隨事都可以看出的。如滿清

的政治中心何以總不穩固？是因爲他以異族來侵略我們漢族，奪取我們的政權，剝奪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雖然表面是可以用威力來壓迫住，但是人民內心的反抗，却常常醞釀着，一觸即發，隨處會生影響的，如此他的政治中心自然常常在動搖的可能之中了，說得明白點，不就是因爲違反了總理的民族主義嗎？滿清的一切制度，有一個最大的病根，就是專制。官的階級分得很多，大官是人，是官，擡得極高；小官不但不是官，甚且視同奴隸，幾乎不是人了。大官堂高籠遠，只享受虛榮，搭足架子，而實在不做甚麼事，國家並非因事設官，變成因人設官了。小官做着很重的事，反而只博得個奴隸的地位，連參加考試的資格都沒有。要知奴隸的恥辱，不是白白的屈受的，一定有所爲，有所圖，要求得代價，於是營私舞弊，無所不至，把一切制度都弄壞掉而後已了。就如戴先生剛才所舉，直接與民衆發生關係的司法警察，保安警察，收錢糧的公差等等，這班人雖都不爲人所重視，而他們所執掌的，却都是地方的要務，就是官吏中的要職。如果求在這種地位的人，都有品格，都能潔己奉公，而上面大官的重重疊疊的專制與壓迫却不除掉，那怎麼行呢？有品格的人。誰肯來幹？來幹的

人，誰又不是足以敗壞法度的呢？我國漢唐以前，小官多而大官少，漢唐以後，便小官少而大官多。秦漢以前祇干涉人民的行為，不干涉人民的思想；秦漢以後，不干涉人或行為，而只干涉人或思想。到了滿清，可算是我國大官最多之時，也是我國人民思想最不自由之時，試問專制到了如此，一切制度就是良好，又如何能有作用？這不明明白是違反着 總理的民權主義嗎？再說民生；滿清初初入關時，所以覺得厲害的，一半固然仗着武力，一半還是因為他能注意民生。我國那時民生實在糟極了，被張獻忠李自成等殘殺攪亂以後，地方真是亂到極處，人民真是苦到極處。滿清一來，大體上居然能撫循百姓，教大家能各安生業，那焉得不在政治上占着勝利呢？ 總理說過：『建國之道，首重民生』。那時滿清既能首重民生，所以暫時便給了他統治中國的機會，接着甚麼康熙乾隆，便都被稱為聖祖仁皇了。滿清中葉以後，政治越過越壞，同時民生也越過越壞，洪楊以後，一班漢臣，如曾左胡駱等，不省大勢，仍以聖主仁君歌頌其主，而絲毫不想民族的自決，並不明白清初諸帝所以得仁聖之頌的相當理由，他們那時在兵戰之餘，並不切實注重民生，所以清末的政治中心，固然失去，

就是一切制度，也維持不了，人民總想法外求生，大都挺而走險，政府又焉得不倒呢？而問起原故來，豈不又是因為違反了 總理的民生主義嗎？

說到幕與吏的弊病一層，就是上文所謂秦漢以後不干涉行爲的結果。原來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秦漢以後政府多給了人民的自由，乃是說政府對於人民太不盡治理之責。譬如保護人民，讓他得以安居樂業，也是這裏所謂『干涉』的一種。滿清時一切所謂內閣軍機，封疆大吏，那本來是壞人，做了官居心就想做壞事的，不必談了，就是爲人好一點，存心好一點的，在他們職務之中，也每每以清淨無爲，高拱端坐爲高尚，一切關於人民的事。聽其自興自滅，自生自長，而不願積極爲人民謀一點進步。但是主要的官雖然在上面如此不管事，以政簡刑清，粉飾太平爲務，而事實是自然要來找着統治的機關，無從清簡的，那麼就完全落在幕僚與吏役的手裏，所謂秦漢以前的小官與小事，便通通由幕與吏兩種人去分別担任，而主官却不聞不問，這其中的毛病就大了。最明顯的是幕與吏一班人，從來只抱個替人做事的心，對外他們本不負責，他們只要暗中替自己的私利打算得周到就是。前清一般的紹興師爺有

一句話說：『紗帽是東家的』。足見他們明知事情做的好的是東家升官，事情做得壞也是東家革職，而他們的飯碗橫豎都有着落，那麼他們的一切行爲，對於人民，還有甚麼好影響呢？至於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乃一切以 總理的主義爲根據，以民衆的需要爲標準，固然要注意制度。更要知單單制度好，是不足以維持根本的，就以戴先生所說到的軍隊一層而論，滿清的軍制，確是屢經改革的；並且內亂一次，軍制改革一次，便延長他的政治壽命一次。嘉慶年間，川湘之亂以後，已把以前的軍制完全變換了，而洪楊以後。又改爲巡防營的制度，後來更改成新軍。及至改到最好了，而清代也就告終了，豈不奇怪麼？原來練成新軍以後，恰巧練出許多革命黨人來，恰巧接受了民族主義，軍隊爲黨人所用，革命就此推進了，這豈是當時滿庭主張革新軍制的人所及料的呢？滿清戊戌變政以後，對於許多制度，有兩種情形：一種乃想改好而終於沒有改好的；一種乃的權改好以後，而對於滿清政府格外不利的。這完全因爲那時的政體和局面，根本違反着立國的大道，三民主義，徒然枝枝節節的在制度上努力，無論成敗，都歸無效啊！

談到考試一層，滿清的考試，分明是愚民政策。一個人拿着八股，試帖，小楷，這些法寶，從秀才，舉人，進士，一路考上去，考到無可再考時，便掉過來，將那些法寶，再去考別人。如此人考我，我考人，考來考去，都是那一套，與國計民生，絲毫無關。猶如現在盲目的民衆運動一樣：我運動人，人運動我，究竟大家所運動的，是否大家所需要，是否黨國所需要，大家都弄得莫名其妙。被這種制度圈套住的人，只管在裏面旋轉，自然莫名其妙了，至於當初利用這種制度的人，心裏可明明白白的，目的是替我們民族造成這樣一種智識階級，去操持輿論，除此以外，別無所謂智識階級，便別無所謂輿論，別無所謂思想，而天下事乃大定矣。這原不是滿清的發明，唐太宗看見士子紛紛到長安來投考，便笑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自來違反民權主義的專制君主，誰不用這套把戲來箝愚民衆，而維持他一姓的尊榮！直到 總理手造了民國，才算將這種根株斬斷，從那無底的陷人坑裏，把一般所謂智識階級的民衆永遠救免出來。至於我們今後實行 總理所定的考試制度，當然是爲的拔取黨國的人才而考試，爲的澄清全國的吏治而考試，爲的實現 總理的三民主義而考試，有

着絕大的爲國爲民的目的，自與以前的所謂考試完全不同了。

以上是兄弟補充戴先生所報告的話。現在兄弟再報告關於黨務的問題。黨員今後當訓練的時期，究竟應該做何種工作，中央幹部的同志，已經深思熟慮的好久了。現在許多同志要工作做，有的實在是解決個人生活問題，也說是求工作，猶如民元的時候，盛行『要服務』一句話一樣。這不能怪一般的同志，而實在怪中央沒有早點定出所謂黨的工作的標準來。兄弟以爲要確定本黨今後工作與運動的標準，有三個前提：一要合於主義的要求，二要合於民衆的利益，三要合於訓政時期的意義。黨的工作猶如學校裏的課程，軍隊裏的操練一樣；學校裏無適當的課程，學生只好睡覺或亂攪；軍隊裏無適當的操練，兵士便不能臨陣，甚且要犯法了；黨員沒有適當的工作，大家閑居，或是盲動，黨的作用何在？所以中央不久就要發表黨員今後工作的標準，教黨員有所遵循；而黨員求工作的，有時只要向這種標準求，或向自己求便行，不必一定要向人求了，這是可以預先報告的。

前一週中，中央幹部已將今後工人運動的標準發表了。工人運動乃民衆運動中要緊的一

部分，所以大家看了工人運動的標準，就可以知道中央對於一般民衆運動的旨趣了。中央先發表了那篇告全國工人書，原是整頓一切民衆運動的入手，同時也就是所以告誡做工人運動的同志，和做一般民衆運動的同志的。凡是要做訓政時期工作的同志，對於這篇文字，都應該細看熟讀，認識清楚。並且要知道：這篇文字內容所定，並非中央同志最近所創，乃根據的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 總理對於工人的演講。可見 總理所給我們的，不僅僅有主義而已，而且有政策。凡是我國工人的痛苦，同志做工人運動應取的方針， 總理當日早已洞察，對於工人所說的那一番話，也就沉痛已極，透關已極了。我們自來沒有切實照 總理的話做，沒有將 總理遺訓在時間上所有的綿遠的常新的價值，時時表彰出來，是我們的大錯！

現在可以把我們同志中做工人運動的錯處，詳細說一下：同志中做民衆運動的，常常犯一個大毛病，就是只顧自己不顧人。他們不將民衆屬於黨，屬於國，屬於民衆自己，而以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所謂『取得民衆』，乃做民衆運動的人取得民衆，歸自己所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如果幾個人同做民衆運動，同走一條路的，那麼大家便都覺得這條路只該自己

走，不該別人走；大家只看見自己的一部分，而不看見別人的別部分，於是就鬧起『奪取民衆』黨內鬥爭來了。譬如同一黨部中，從前分青年，婦女，商人，工人，農人等部，假如你代表青年部講話，他代表婦女部講話，我代表工人部講話，那我們三人就各人祇見到各人所代表的一部，見不到他人所代表的各部，也見不到整個的黨部，更不必說到整個的黨了；遇到甚麼事件，三個人先爭論不已，更不必說三個人工作影響所及的地方，格外觸處起衝突了。現在黨部變更了制度，合併成組織，訓練，宣傳三部，縱的方面沒有甚麼分別了，但是橫的方面每部對於民衆所說的話，仍舊不與其他二部所說的相同，若似乎非如此在自己的立場上不足以稱爲『代表民衆』。窺其用心，是何等的專精，同時又是何等的狹窄呢！狹窄到了極處，便不知有國，不知有黨，而只知有己了。季陶先生曾經代表中央對許多同志說道：『大家倘若既忘却了『中國』，又忘却了『國民』，那麼大家自問，究竟屬於何國？究竟屬於何黨？究竟做的是那一黨的工作呢？』這句話說來真覺痛心！許多同志不明白 總理的主義和政策，只以爲動便是革命，至於未動以前，應該如何，既動以後，應該如何，通通不顧慮到，而

只管盲動妄動起來，結果自然要一直動到中國以外，和國民以外去爲止了。

同志們做民衆運動，所以走上這樣錯路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乃誤將破壞革命中適用的民衆運動，應用到建設革命中來。目的在破壞的民衆運動，原比較簡單，不過設法教民衆動起來，達了破壞的目的，一個運動就告終了，事實上需要顧慮的地方比較少些。至於現在，却大非其時了：甲部分人的運動是與乙部分人有關的，是與全民衆有關的；前面的運動是與後面的運動有關的；運動的目的也大了；運動的方法也難了；何能輕舉妄動，而不通盤籌算呢？戴先生說過：『在民元以前辦報，可以不要甚麼文章，只要在報紙上排印三個頭號大字：『殺！殺！殺！』作用就夠了。試問現在辦報，可能仍用三個『殺』字去代替文章呢？現在再教戴先生去辦報，他是斷然不會再這樣笨做了吧。兄弟以前也曾說過：『我們的敵人緊逼着來。我們到他的後方去放一把火，對不對？對的，因爲對於逼緊的敵人，只有破壞，沒有別樣。現在統一了，建設了，而自已分出前方後方來，向自己的後方也放一把火，這究竟是奸細的行徑呢？還是同志的行徑？』這樣極粗淺的道理，一定不會還有人不明白，不

過因爲其人私心太重，一心只要把自己捧出去，覺得自己背後如果沒有工會，或是所有的沒有別人多，就表示不出自己的狠處，這樣一來，對於別人明明是同志同胞的，不知不覺的也視同敵人一樣，從他後方放起火來，並且不知不覺的把破壞革命的民衆運動誤用到建設革命中來了。第二個原因乃上了共產黨的惡當，自己始終未悟。許多同志在本黨未曾清黨以前，曾經有若干時候，和共產黨合作過的，便深中了他們的毒，而至今積習未除。卽如說話一件小事情，如果喊的聲音不如他們的大，心上便覺得他們革命些，而自己不革命，一定要勒破嗓子的喊起來，等於他們，或甚過他們，然後才快意。凡事都以共產黨徒爲準，並且要變本加厲的，自己格外甚過他們，可糟不糟呢！鮑羅庭在海參威曾經對兄弟說過：『有許多過分的舉動，都是你們國民黨裏自命爲左派的人做出來的，我們共產黨並且敬謝不敏，還做不出來呀！』真的，有時候他們不過提議工人每日工作七八小時，而我們有人要更革命些，便提議每日工作五六小時；他們不過替工人要求加薪一倍，而我們有人要更革命些，便要求加薪三倍。如此的力求革命，如此的做民衆運動，動機何嘗是爲革命，爲工人？完全爲的把自己

捧出來罷了；辦法又何嘗顧到全體民衆，整個國家，和永久大業？只看到工人一部分人，和目前的一時罷了；而結果却是全民全國永久受害，就連工人一時的利益又在那裏？那班人刻剝要捧自己的，倒底能把自己捧到那裏去呢？

國內有許多地方的工人，現在已經明白了。如廣州工會已知道罷工加薪實在沒有好處，因爲工錢一加，資本家便不得不擡高物價；物價是一擡百擡的，工人所加的薪水，甚至不夠抵充生活中因物價擡高的多費。工人在工廠以內雖然是製造者，但是出了工廠以後，終免不了要做消費者的。進了工廠多得的錢，出了工廠又完全失掉，不過過一過手而已，那又何苦來呢？再則機器工業全靠有相當的資本，相當的贏餘，才能發展或維持；鬧到工廠開不成，根本且無工可做，無薪可拿，加薪不是變成空的了嗎？廣州火柴廠原有三四十家的，因爲鬧加工錢把廠都鬧的倒閉了，大家既非用日貨不可，而工人又無處求生。襪廠將近百家的，也因爲鬧加工錢鬧完了，又是一大批工人賦閑起來，印刷廠鬧加工錢把廠鬧倒了一大半，廣州的印刷件分頭到廈門和香港去辦理，覺得價廉物美，廣州市的印刷業，便就此一落千丈，而

印刷工人的生活 and 前途，也就此一落千丈。經過這許多事實以後，廣州工人明白了，再也不隨便聽人鼓惑，輕舉妄動了。漢口工人從去年起，也有了相當的覺悟。有人勸他們要求加工錢，他們便說：「工錢可以允許你們去要求增加，但是我們以後要長久有工做，請你們給我們一個切實的保障」。這就是工人已經覺悟的表示。說到這裏，事情就覺得奇怪了：何以工人本身本來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已多覺悟到此，而做工人運動，自命爲最革命者，爲先知先覺，後知後覺的人，何以還不知注意及此呢？如果說有許多工潮是未覺悟的工人攪出來的，並非做工人運動的人帶錯了路，那麼，最革命者是應該始終設法去領導着多數民衆，而始終不能爲少數民衆所領導的呀；不覺悟的工人亂鬧罷工，做工運的最革命者便束手無策，聽其自然，甚至隨聲附和，跟着亂跑了，這究竟成個甚麼最革命者呢！

自命爲最革命者心目中所最景仰的應莫過於俄國，現在便就俄國來說，我們先要問：俄國何以要舍去一切本來所謂共產的辦法，而退到新經濟政策上來？何以不讓工人自己去管理工廠、而仍要另外派人去管理？何以仍要定下生產的限額，工作的時間，工資的多寡等等？

自從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八九年來，何以工資仍舊很低，且沒有回復到俄皇時代的標準？何以增加工資一定要等生產額回復舊觀以後？何以一九一七年以前便到處運動罷工，而一九一七年以後罷工便是反革命？這許多問題大家不可不研究清楚。又當時反對新經濟政策的布哈林，托羅斯基等人，都是左派。俄國人對於他們的話何以不聽？而反去聽那十分右派的列寧的話，把政權交給他，要他領導一切？列寧死後，托羅斯基，齊諾維夫一千人，和史丹林比較起來，依然是左派，何以俄國人仍不加以信任，而又信任史丹林？足見所謂最革命的國家，也未曾完全向左去。史丹林等都對我們說過：『你們中國革命，可莫再上我們一九一七年奪取政權以後所上的一番當了』。他們既已明白自認是上當了，何以我們自命為最革命的朋友，仍舊要找當去上呢？原來是奉的第三國際的命令，受的他們的騙。但是他們既然自己曉得做錯了，不那樣做了，何以對於別人，事實上還是那樣引誘，那樣搗亂的呢？同一件事情，又何以在別人的時代，他們以為要的，到了他們的時代，又不要了呢？原來『楚人有兩妻，人誂其長者，長者嘗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

汝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嘗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嘗人也」。居俄皇之所，勸工人罷工，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的工人，則欲其爲我而拒絕煽動罷工之人也。爲自己謀，自然新經濟政策等等是好的，到中國來，可算是「彼人之所」，而非「我妻」，自然以搗亂爲務了。第三國際的全套把戲，可算完全包含在國策的這一段寓言之中了，大家想想，好笑不好笑呢！

再進一步談談共產學說在現在世界上，已有逐漸見諸實際的情形：兄弟經過歐洲時，見歐洲各國，如德奧等，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實在和馬克思的學說同一根源，但是他們說馬克思祇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照馬氏的話說，所謂共產，也要經過一定的行程，經濟情形達到一定的限度，才能實現，不是硬做做得好的。俄國十幾年的紛擾衝向前去衝不通，又退回來，是因爲沒有聽馬克思的話，當然要栽一個筋斗，本無足怪。「無產階級」一個名詞，定義本來很難下：起初是說窮困的人便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却說沒有生產機關而受壓迫的便是無產階級。現在對於這兩個定義，都可以承認。試看實施社會主義的各國，工資很高，物價的指數

比工價低，工人的生活與一般人平衡，如果還說工人窮困，另成一個階級，實在不可能了。至於工廠營業的餘利，也提出來分給工人。德國有一個製造望遠鏡的工廠，他的辦法簡直把本廠的股本分給做工兩年的工人。照他的辦法算起來，二三十年以後，那個廠的全部股本，便都歸廠中工人所有了；但是廠主的眼光遠大，計畫精密，在這樣辦法之中，他的利益依然很好。既然工廠的股子都是工人的，那麼再不能說工人是沒有生產機關而受壓迫的份子，所謂無產階級，就此不成立了。像這樣的人人有產，共同有產，誰人不願？何處不通？一定要把社會上都攪成窮光蛋，都攪成無產階級，然後才有全體的幸福可求嗎？馬克思的共產主張，又何嘗是如此呢！而第三國際宣傳得厲害的，就是說第二國際德國社會民主黨怎樣不革命。固然，他們不是一味主張暴動的，而且在歐戰的時期，保持不住國際工人反對戰爭的決議，難免失節的譏評；但是並不能因此就一概抹煞，說他們是不革命。馬克思做共產宣言的時候，是一個革命者，做資本論的時候，也還是一個革命者；早年參加暴動運動的時候，是一個革命者，晚年追悔，說工人還要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幾十年，也還是一個革命者。暴動是一

種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有時還做了反革命的工具，這是很清楚的。德國工人的知識，已經很高，而工人的待遇，工人生活的各種設備，比起俄國所有的來，不知要好多少，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就不容易煽惑搗亂了。英國有個小說家形容得好：在俄國式的共產社會中，如果在街上有人問你所穿的衣服是那裏來的，你千萬莫說是自己的，或是買的，做的，都不行；一定要說是搶得來的，不然你的衣服就要被剝了。因為身上衣服是搶來的，足見本來沒有衣服，是個無產階級，而居然能搶一套衣服來穿穿，足見是很能革命的。如果衣服是自己的，便是個資本家，而且承認了私有權，自然馬上要去成他人革命之美，而衣服要被他人搶去了。原來俄國式的共產與革命，就是搶而已矣，沒有別的！不過更有一層我們要明白：這些形容的話，已不是俄國現在所有的情形了，他們實在早經覺悟，早已改絃更張，並不如我們自命爲最革命的朋友，心目中憑空所想像的蘇俄天國，無產階級是怎樣專政，農工是怎樣幸福，全國是已經到了黃金時代，有了多少多少產業，大家在那裏共不完的共着，事實上一切何嘗如此！我們只要看史丹林幾年在全國大會裏所報告的，無非是說那一樣衰落的工業已

經回復了幾分之幾，那一種歉收的生產品已經增進了幾分之幾，並沒有報告說已經共到多少人的房屋，多少人的田地等等呀。足見人家現在正從火坑裏一步步的向外爬，而我們一定要咬定人家是在火坑裏摸着多少寶貝，而我們也趕緊要造起那樣的火坑來，大家好向裏面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現在訓政開始，已經把政權治權，分別得清清楚楚，正要充實中央，健全政府，領導地方省縣的行政機關，通力合作，把全國的一切，納諸軌道之中。不能以局部而影響全體，尤不容以一部分特殊的制度，而破壞整個治權的統系。所以民衆運動，民衆團體，不能各自爲謀，而不顧其餘。如果工人歸各級工會及工統會管理，那麼農人，商人，學生等，都可以如此，士農工商，各自成了立體，獨立開去，所有地方各級行政機關，還有甚麼可管的呢？只好管管流氓土匪了，這那裏是 總理的建國方略嗎？中央根據 總理的遺訓，規畫了今後民衆運動的方針，經過政治會議，中央常會決定以後，頒示全國，大家要切記得這就是總理的主義和政策。我們目前實在已是民窮財盡的時候，國家的地位，何等危險！白色帝國

主義在那裏盼望我們國家的不統一，原想孫傳芳張作霖等維持下去，中國不統於一，而統於二三。如今他們失望了，只好去一旁祈禱上帝，怎樣再給他們一個相當的機會。赤色帝國主義又在那裏盼望我們的黨不統一。他們自從分拆本黨之計不售以後，不止祈禱而已，竟是繼續不斷的在旁邊想方法，怎樣便能混淆我們革命的理論，錯亂我們革命的步驟；總想把我們的黨裏，攪出新派，舊派，左派，右派，西山派，東山派，在朝派，在野派，種種分別來，然後好遂他們的心願。大家如果看見我們的同志同胞，都能信仰 總理，同心協力，完成全民革命，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廢除掉不平等條約，而始終無系可存，無派可分，他們自然不高興了。可是我們自己，難道還有以一切帝國主義者不高興為憾的，而一定要投其所好，應其所禱，鹵莽滅裂的幹一場，終於讓友我者失望，而仇我者快心，然後自己也方才快心嗎？凡我同志，以後對於黨的工作，一定要注意這最淺近的两點：一乃不要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一乃不要只顧目前，不顧日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是不肯犧牲，不肯救人，絕對反革命！只顧目前，不顧日後，是不能進化，不能建設，又絕對反革命！這是千真萬確的革命

理論，大家不可忽略。我們對於舊時的一套，以往的過失，不要再讓他來顛倒黑白，混亂我們的思想了，思想是從心裏發出來的，既知道革命先要革心，那麼清黨也先要清心啊！

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 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中央禮堂演講

工作好比夜行，理論就是燈火。——領導民衆，先要使民衆認識我們的真誠。

——領導民衆，要革命者民衆化，去深入民衆。——領導民衆，要以人格去感

動民衆，使民衆革命化。——革命性的真義，在肯愛人，肯打不平，肯犧牲自

己。——革命工作要科學化，紀律化，責任化。——同志的言論自由，要應用

在同志間的研究討論上。

各位同志：今晚是本市第十區黨部第一次舉行演講會，兄弟得以參加，甚為高興。因為以前在廣州，在上海，曾經參加過區黨部的演講會，若在南京參加區黨部的演講會，今天還是第一次呢。大家同志常常聚會，交換意見，實在是件極有意義的事情。第十區黨部的同志，大都是在中央服務的職員。對於黨的見聞思考，比較一般區黨部的黨員，一定更多，那麼舉行這種會，便更有意義了。可惜今晚第一次舉行，而出席的人便不見得十分多，不無遺憾

。凡是做黨的工作的人，工作之餘，一定要常常的研究理論，然後他所做的工作才能完全合乎理論。工作好比夜行，理論就是燈火；有了燈火照着，夜行才有把握。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理論，理論固然領導了工作，而工作中又會生出新的理論來，那就格外相得益彰了。工作固萬不可離開理論，而研究理論，也萬不可丟開事實，去說空話。同志中工作之餘，能夠常開演講會，而演講會中，倘又能如此去討論研究，那不但一堂相聚，各剖衷懷，精神上得着愉快，並且實際工作上能夠集思廣益，功效可就更大了。兄弟今晚有各方面的話要講，因為大家常見面，對於一般的意見，發表的機會很多，或是大家已多注意到，現在不必講了，祇講一點關於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的話，為同志目前就該注意的。

自從北伐成功以後，我國居然在革命黨手裏統一了，這雖然是可以慶幸的事，但現在尚非本黨黨員安閑逸豫之時，我們正要從客觀方面去留意黨的現在地位，是由那裏來的？是由過去的 總理的領導，和諸烈士的犧牲奮鬥得來的，絕非偶然。我們有了過去的黨史，黨史上有了相當的成績，然後我們才能得着政權，而統一國家。過去既統一了國家，今後就要建

設國家。這建國的責任，我們便不能推卸；但是同時也要曉得這種責任實在不容易負。而且我們以一黨治國，比起別國有幾個政黨，同時相對，可以互糾過失，共督政府的，便責任更大。而做得好更難。我們不但消極方面無從規避責任，並且積極方面要真能盡了責任。在這一個建國的總責任中，最要緊的，當然是領導民衆的一種責任了。所以以前經過許多犧牲，許多痛苦，由軍政時期遞入訓政時期，可算是我們既往已盡之責；從此再不辭艱苦，不避勞怨，領導民衆，由訓政時期而早達憲政時期，又是我們當前待盡之責了。

我們應該如何去領導民衆呢？第一步先要教民衆認識我們，信任我們，是真誠的，而不是欺騙的。平常我們教兒童讀書，兒童如果不聽我們的話，不跟我們去做，甚且見了我們便哭，或者他們心上已有了主觀，覺得不讀書的好，那時我們，可以用糖去騙他讀書，或是允許他讀完了書便可以去玩。但是我們去訓導民衆，可不能如此，而且事情也不是如此簡單的。我們在破壞時期，一時權變，容或用刺激的方法，去喚起民衆，那是可以的，那是比較簡單的。現在那一套可不行了，因為民衆在過去十幾年中，已經受足了痛苦，對於我們，正

抱着莫大的希望呢。在軍政時期中，我們自己會就最高的限度，對民衆發表過多少宣言，提出了多少政綱，至今尚未一一實現，民衆正引領而望，等待我們把從前發出來許許多多支票，一一照數兌現呢。當然，因為政治上面的許多爲難，一時是不能攪好的，但是我們對於民衆的責任，民衆對於我們的屬望，在我們自己固然不能丟開，在民衆也斷不會輕輕放過，而肯含糊了事的。那我們在訓政時期去領導民衆，如何能用一毫哄騙的手段，如何能存一點暫時倣倖的心呢？當然要腳踏實地，誠懇懇懇的去，完全保持着我們的信用了。所謂政治，原就是關於民衆的事。何以在這個上面會發生困難，而教我們一時不能有志遠遼呢？一乃因為國內外的環境不好，凡事不能由你快做；二乃因爲民衆的程度太低，能力不夠，一時推不動，況且有許多事，簡直非民衆自己明白認識，自己向前求進不可的。如增加生產一件事，憑你制度方法定得如何好，道理勸導得如何透澈，農人工人倘若不發奮，各人的兩隻臂膊倘若不肯多多用力，生產增加的程度是總歸有限的。我們既不能代替他們的臂膊去多多用力，我們對於國民經濟的十分發展，對於國民生活的長足進步，有何辦法致其速現呢？所以自治是

很重要的，人治，官治，總不如自治的澈底。自治一層，在我們國內，以前一直就沒有辦到；何況近十餘年來，兵匪相乘，民不聊生，喪亂之餘，一下子又如何能夠實現自治呢？說到這裏，話又說回來了：要民衆能夠自治，還非得由我們去費一番訓練領導的工夫不可。不過當開始訓練之前，要就我們以前向民衆已發表的宣言，目前爲民衆新確定的綱領，在我們今後逐步能力做得到的範圍以內，和民衆事實上那種急需，那種緩需的實在情形之中，預先計劃一個步驟出來，一步一步的提醒民衆，一步一步的替民衆做，莫教民衆一時奢望，而日後失望。尤其是無論計畫，無論實行，我們始終總是誠懇切實，完全爲的民衆，而不是爲的他；不可有半點利用民衆的心思，更不可有一毫欺騙民衆的行爲。倘若說以前用許多宣言，在民衆面前誇下大口，又用許多力量，把民衆爭奪過來，今而後便悄然息，甚麼都不提了；或是格外用民衆做個幌子，以圖抓住政權，去遂自己的陰私，那斷斷不是本黨的用心啊。

第二步的領導民衆，我們要到民間去，並且深入民間。我們必得趕緊檢查自己的一切，是否已經民衆化，平民化；斷不可自己造成一個特殊的階級，而與民衆格格不相入，民衆的

思想，原是直覺而不加深思的多。你心裏雖挾着一番精微遠大的計畫，要訓導他們，但是你的面目舉動，倘若有一種特殊階級情形，那對不起，他們一定要辜負了你的盛意了。譬如到一個村莊裏去做訓政時期的工作，斷不能仍舊是軍政時期的那一套：貼標語，喊口號，激烈的演說，命令式的指揮。就算完事。今後我們的生活，要完全與民衆同化；所說的話，要切合民衆的本身。農人，工人，商人，各有各的甘苦和願望，我們預先應該深切體會過，先合他們的心理，引起他們的同情，然後再慢慢的領導他們的意識到我們的目標上來。這樣一回兩回的先教民衆與我們十分接近了，然後我們的計畫，才能十分與民衆接近。那知現在有一班同志，誤解了『黨權高於一切』的一句話，以爲單獨黨員也能代表全黨，自己既是黨員，自己的權柄就高於一切了；於是和民衆接觸，惟恐民衆不曉得他，不尊重他，有高於一切的權柄，馬上千方百計的擺起黨員的架子，一舉一動，一舉一笑，幾乎都表示出與衆不同的黨氣，攪得現在內地有所謂『黨老爺』一個壞名詞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民衆對於黨員，惟有敬而遠之了，那裏還肯受他的領導和訓練呢？幾十年前，我國人人不知道革命，人人不肯

革命，在那時革命黨人是專門以革命爲職務，尙且怕不得人民的同情，不來參加革命。如今大家努力的是完成國民革命，革命要民衆化，民衆要革命化；革命已非少數人的事務，如何能獨自占據着他，成爲一種階級呢？何況國民黨提倡的是全民革命，全民革命中，絕對不許有甚麼階級的，豈有自己反而獨成一個階級的道理呢？從前的時候，革命者在民衆之中，雖然分別得很明顯，而進行運動，對於民衆，還是要力求平易，而不教民衆驚擾，何況如今，革命者應該做的是民衆的事，民衆應該做的是完成國民革命的事，倘若有一部分人，以爲一切權利屬於自己，以爲自己高於一切，離開民衆，那幾乎要做反革命了，還成甚麼做訓政工作的革命者呢？所以『平民化』三個字，在革命者看來，尤其在做訓政工作的革命者看來，意義實在極深，而作用實在極大。大家如果不能與民衆同化，與民衆同甘共苦，那就不必想盡訓練領導之責，而與民衆共成建設的大業。

第三步領導民衆的方法，是鞏固領導的地位，使民衆對於我們，由信用而成信仰，並且信仰日堅，而在我們領導民衆所要到的許多目的地之中，這也就是一個。到那時，真是民衆

都革命化，而國民革命已底於成了；民衆自治的力量，行權的能力，已不必說，而憲政的康莊，就此踏上了。原來這所謂第三步的，一切定要比第二步更進一步：第二步是與民衆同甘共苦，第三步是甘比民衆來得少，而苦比民衆來得多，反而不能與民衆甘苦悉同了；第二步是革命者不許成爲特殊的階級，第三步是革命者在犧牲方面，在吃苦方面，一種赴湯蹈火，奮勇當先的精神，又實在要超過民衆，而獨自達到一個特殊的度數才行。我們要知道：破壞是革命的工作，建設更是革命的工作，軍政時期是革命黨的任務，訓政時期更是革命黨的任務；後面所需要的犧牲精神，實在比前面所需要的還要來得大。如果以爲軍政時期的革命才要拚命，很危險，好得現在已經過去了，已到了訓政時期的革命，不要拚命，不要冒險了，大家樂得來做一個『太平宰相』一般的『太平革命者』吧，祇享受那革命者的美名與優遇，而實際上並不犯到革命者的危難，這種遭逢，真是千載一時，可遇而不可求，世間美滿的事，便宜的，更沒有及得上這個的，唉！那簡直是投機份子，腐化份子的心理，那裏是革命的心理！更那裏是建設革命的心理！革命那裏是這樣！建設又那裏是這樣！訓政時期的革命工作

，又那裏是如此容易做的！我們又要知道：從前革命者在社會中所以成爲特殊份子，究竟是那一方面比民衆不同些？享福的方面呢？還是吃苦的方面？當然是吃苦的方面了：一般民衆怕死，革命者拚命；一般民衆只打算及身的一世，革命者打算民族的將來；一般民衆留戀現實的人生，革命者嚮往理想的人生。所以就犧牲吃苦，一方面說，革命者超過民衆所有的度數，在從前破壞時固然應該很明顯的，就是現在建設時，仍舊應該很明顯的。這種精神，就是我們今後在領導民衆之中，第三步所需要的。沒有這個，我們就是失了革命性，接着一定要失去領導的地位，雖然具了第一步的誠心誠意，雖然具了第二步的平民化，効用仍然不能久長，不能深刻。俄國共產黨員可佩的地方，就在義務比非黨員盡得多，而責罰比非黨員受得重；惟其如此，黨才能站得住，在民衆裏面，領導的地位才能鞏固，意大利法西斯蒂黨的理論雖然不好，但是他們黨內指定三十萬黨員爲義勇隊，社會上一發生甚麼事件，他們馬上和軍警一樣的不顧艱險，犧牲自己，爲羣衆謀幸福，而他們平日，並不與軍警得着同樣的給養。我們既然以黨治國，既然去領導民衆，這種精神當然不可少。臨難固然要奮不顧身，就

在平日，也要比民衆多負責任，多担工作，多吃苦頭，嚴守紀律，嚴受制裁，嚴受懲罰，然後民衆對於我們，信仰自堅，追隨自順，而同化自速。及至全國民衆都與我們同化了，便都是 總理的真實的信徒，都經了黨團的切要的訓練，全體國民的自治何患不能做到，而三民主義的國家，何患不能實現呢？所以我們今後去做民衆運動，簡直要從鍛鍊我們自己的人格入手，既是黨員，簡直要祇盡義務，不享權利，然後以這種人格來感動民衆，而民衆跟我們動起來，並不是以我們的空言去感動他們，或以我們的手段去攪動他們，或以我們的心計去勾動他們，對他們絕無所利用，絕無所假借，這才是本黨所需要的民衆運動，這才是我們所以領導民衆，所以做訓政工作，所以去努力建設革命的真正途徑。同志們，注意啊！

接着來談談革命性。革命性究竟是甚麼呢？並不是指性情暴躁，態度兇悍，舉動奇怪，手段狠辣如是種種；革命性乃肯犧牲自己，而爲羣衆，這是最要的根本。從前有個俄國人問總理，革命的思想，從何而來。總理說：『從愛人來的』。而總理平日又說，『革命是打不平』。因爲愛人的原故，遇到不平便不能不去打；去打不平，便要犧牲自己，這是革命

性的最大的表現。在愛人，打不平而犧牲自己之中，所包含的守正不阿，信仰主義，不遷就，不妥協，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都是革命性的表現，若對同志同事同袍吵鬧，衝突，發氣，搗亂等等，那算甚麼一回事呢！從前汪精衛先生去刺滿清的攝政王時，曾經用指血寫過一封信給兄弟，裏面有八個字說：『我今爲薪，兄當爲釜』。他的意思是柴在鍋下先燒起來，然後鍋中的米方有成熟爲飯的希望。不過單單有柴，米終無以爲飯。柴的作用甚烈。但霎那間，本身已燼；而鍋的作用既要具堅忍性，耐得煎熬，甚至被煎熬到破了穿了也說不定，又要具傳熱力，能夠把生米變成熟飯。他去捨命暗殺，是去做了柴，而希望我們負擔一切艱苦不盡的革命工作去做鍋，仿佛是革命黨中的一段程嬰杵臼的故事。他先半年曾在民報上做了『革命之道德』一篇文章，最後一段就提出薪與釜的比喻，非常沉痛，感人甚深。其實那時兄弟接到他的血書時候，正在我們運動廣州新軍舉義以後，三月二十九日以前，都只願得自己做柴，並想不到誰能做鍋。這個比喻，如果應用到現在來，那就應該說：在破壞時期，大家都做的是柴，而做鍋的機會很少；既經破壞成功，大家都得做鍋，忍耐煎熬，把

一粒粒的米，化成一粒粒的飯，讓別人來吃，自己只管做鍋而已；從來只見鍋煮飯，鍋裝着飯，而不見有鍋吃飯的。這樣比譬，可以算是整個革命性的描寫了。當我們依照上文所述的三個條件，去做訓政工作，去領導去訓練民衆時，我們不要具有這樣所謂的革命性嗎？將來儘管吃了大苦，而事情的成績，仍不能如我們所期的，那是意中之事，我們總得一一忍耐下去，而一心一意的再幹。幹到後來，幹成了，只有別人的，並沒有我們自己的；這是我們在未幹以前，和既幹以後，心裏老早有着，並且刻刻有着的觀念，並沒有第二句話說，並不轉第二個念頭。這種情形，就是我們今後在工作上，應該有的革命性的表現了。我們看 總理的最後工作，在廣州時，自己率領軍隊，到東江等處去打仗，仍舊做的是柴；一旦吳佩孚曹錕倒了，北方換個局面了，比較是個機會了，總理乃一人扶病北上，主張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就是去做鍋了。不幸所志未伸，而已中道崩殞，試問 總理一生可曾離開過做柴做鍋的地位，而想自己去吃飯的呢？誰都不能說 總理提師北伐是革命，扶病北征便不是革命！ 總理懷着早息內爭，早安民命，百端更始，迅圖建設的十二萬分熱誠，不辭艱屯

，不計生死，扶病登程，遠道北上，一路不斷的宣示自己對內對外，澈始澈終的革命主義，與革命方略，這一段最後的崇高偉大的革命精神，凡我後死的同志，誰個能比？誰個能忘？誰不應感動激發，引為模楷，在本黨今後待盡的責任之中，照總理那樣的精神去做，以竟總理未竟之志！豈可以忽略了這種大的真的革命性，不去認識，不去培養，而轉被那種恣睢暴戾，叫囂驟突的浮薄行為所歆動，反而染上了反革命性，果然是 總理的忠實信徒，應該如此的嗎！

以上種種，可算都是關於革命理論方面的話，現在再來談關於革命工作的話。無論中央與地方，現在所謂工作，都有黨部方面的，與政府方面的兩種。做這兩種的工作，都不應該當他是自己的謀生，存心都該是為黨，為國，為社會的；因為這兩種工作，與別的不同，都是直接的革命工作。無論做甚麼工作，一定要講求個效能的增進。訓政時期是愈短愈好；推進民衆是愈快愈好；我們看看世界上的大勢，便知道甚麼都不容我們慢吞吞的牽延時日了。那麼做革命工作的人，更應該如何的去求效能的增進呢？第一，我們以前工作中，不懂用科

學方法，因而費時，費財，費力，各方面太不經濟，而效能不見其增進。兄弟常想，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要推中國人最奢侈了。這句話聽來很可詫異：我們人民平時惡衣敝食，生活簡陋極了，人家工人的住屋裏面，都有地氈火爐，工人以上，更不必說，何以比起來，最奢侈的反而屬諸我們呢？原來人家的奢侈乃奢侈於用物。而我們的奢侈乃奢侈於用人。人與物比起來，應該那一樣貴些呢？當然人貴了。我們所奢侈的，比別人所奢侈的根本來得貴，那得不算是窮奢極侈呢？何以說我們是奢侈於人呢？兄弟看見有許多同志，在國內平日用五六個人，還覺不夠的，一到歐美去，連一個人都用不到，祇算用了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個人而已，而生活方面的便利舒服，絕非在本國用五六個人的所能比。外國的空間非常經濟。無論個人或家庭，所占有的空間，比較同等經濟力量的我國人所占有的，一定小得多。一間臥室，一間客廳，一間書房，連在一處，所有整潔的工作，不一定要專僱一個人終日其事的，只要有人每天某時來一會兒就行了。此外生活所需，一舉手就可以得水，一彈指就可以得火，那裏像我國的生活，單單吃飯一項，廚夫以外，因為用水要一個人去挑，因為用火又要一

個人去燒呢？加以我們房屋的構造太散漫，交通的器具太不完全，人的性情太懶惰，體格太衰弱，心理太好虛榮，而一方面又民生太艱苦，民智太低落，缺乏職業，生路太少，於是富有的便放縱於用人的奢侈，貧苦的便自儉於物。應他們的所求，而聽人奴使。往往一家上下，十餘人之中，只有主人一個是做正經事業，或是生利的，其餘都不過去適應或幫助這一個人的生活方面的一切罷了。甚至連這一個主人也就在許多人中，生活生活而已，別無所事的，那也太平常了。於是我們民族以現有四五萬萬的人口，占着縱橫數千里的一塊大地方，子子孫孫，前前後後，已經忙了五千多年，而所有工作的效能與成績，反不及那人口，土地的衆廣，文化歷史的長久，都只當我們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豈不可恥可歎呢！這種浪費消耗不經濟的工作情形，還不由我們今後訓政時期的革命工作中，開始領導去切切實實的革除掉麼？究竟在工作之中，空間時間，人力財力，怎樣才通通經濟呢？那就非一切都採用科學的方法不可了。

第二，我們以前工作中，紀律太差，秩序太壞，因而顛倒重複，彼此力量抵銷，或惹出

無謂的糾紛來，把有限的力量，銷耗於無用之地，而工作的效能，終於不見增進。這一層兄弟也常常說到的。要知黨的紀律作用如何，只要看『黨要軍隊化』一句話，就可知道了。人羣集合的作用，到了軍隊，再講效能不過了，試問軍械雖利，倘若是紀律毫無，他的效能何在？臨起陣來，軍令不一，調度不動，兵自爲謀，那就是烏合之衆，去效能二字遠甚。軍隊不能成烏合之衆，黨既要軍隊化，難道黨便能成烏合之衆嗎？人羣的集合，到了政黨，程度已經很高了；政黨之中，又是有主義的革命黨，革命黨的事業，又是由破壞而到了建設的，可算是高而又高的了。既然在羣的制度上，到了高而又高的地位，除掉所謂理論方面有主義以外，這種高而又高的地位，全靠甚麼來維持？當然是全靠那嚴而又嚴的紀律了。外人笑我們是一團散沙，就是笑我們民族缺乏羣治的能力。國民的羣治能力，的確缺乏，所以總理定下建國方略來。是先以黨訓國，訓得全國人民大半能夠自己羣治了，然後再實現民主的國家。全體國民的羣治能力，全靠本黨這個老師來傳授呢，如果做老師的仍舊是烏合之衆，那不是一切都完了嗎？這樣的老師，何以對總理！又何以對國民啊！所以前兩星期中，常常有

同志不守黨紀，對外妄發言論，看了真教人害怕，覺得許多同志的羣治的觀念，紀律的訓練，太差了，怎麼好做人的老師！我們現在既做訓政時期的革命工作，既要增進效能，那種一團散沙的譏評，當然又非由我們開始領導，切切實實的去免除掉不可了。這一層各位同志既多在中央服務的，應該早已明白，早已注意到，可以不必多說。第三，我們以前工作中，責任心總嫌不夠，遇小事疎忽，遇例行的事放棄，遇繁瑣的事壓積，遇難事推諉，遇錯事抵賴，以致事情不能按時而成，按地而舉，按規矩制度而行，而效能不見增進。許多同志對於小事情總不肯賣力，能夠派給別人做的，總想法派出去。被派的甚至因為事情不在他職分之中，事情雖然代做，而責任却不肯代負，那件事便始終沒有人負責。在這種情形之下，像前清衙門裏幕吏的一種毛病，固然馬上就來，而且凡是意外的變故，重大的損失，事後追究起來，往往都由於平日對於某件小事的疎忽，無人負責。廖仲凱先生在廣東被刺，黨部裏邊會有刺客，起初以為防不勝防，不能責備誰；而實在是黨部的警衛如何布置，從來無人負責，諸多失當，並不知道，因釀此禍。所以要機關好，不能不注意小事；要居常處變，一樣的有

效能，更不能不從小事訓練起。還有許多同志覺得天天照老規矩辦事，呆板板的做官樣文章，不但毫無興趣，而且不免官僚化了，有些小事，姑從簡略，或竟予廢置吧，這可更不好了。『官僚化』一個名詞，中外的意義不同。我們觀於外國所謂官僚化，實在並非廢化，而且是很很有價值的。因為外國所謂官僚化，乃天天按時到位，在一定的範圍以內，按部就班的做法；規矩格式以外非所知，而規矩格式以內絕不亂。規矩格式這東西，一方面乃科學化的一種，頗有作用；一方面規矩格式所到，就是責任所到，毫無躲閃含混的。怕按照規矩格式的朋友，實在就有些怕負責任的嫌疑了。這種官僚化的短處，是在凡事被動，機械式的，不能隨機應變，有所發展，不能負大責任；並且工作好像是買賣式的，做多少事，換多少俸祿，其餘不管，其餘也不要。但是與我國所謂官僚化，貪污放縱，虛僞權詐的，却不可相提並論，並且兩下正站在反對方面。我們今後做革命工作，本國官僚化，當然絕對不能染，而外國官僚化，除掉無理論無意志一種不應學他外，其餘是應該學的。至於事情繁了便壓積起來，那真是我國官僚化的一種了。我們要知道：凡事有個時効，時的遲早，往往就是効的小大。以

前官僚的衙門裏，並不是不辦事，毛病就是來得意慢！越是人命關天的急事，有時越是慢慢的，或別有作用，或竟是他的官方官派，如此而已。事情的效能，既隨時間而變動，倘若失去適當的時間不辦。後來雖然補辦，而情勢已非，依然不能算是負責的。真負責的人，不能不承認事情的有時效。我們今後在革命工作中，遇到繁劇的事，應該早了的，或加工趕做，按時完結；或提挈綱要，先辦個眉目給別人，讓別人該繼續的好繼續下去；或根本上設法，簡括其事，以後不令再陷到繁劇的地位。總不可以不顧別人的死活，把事情向腦後一攔就算了的。說到黨員做革命工作的負責，還不能與泛泛的負責比：黨是整個的，黨是整個的去對外的，所以黨員也要整個的去對外負責，同時自己也要對整個的黨負責。對外不能說：『某事是本黨某部分的同志所做，非我所做，我不負責』。對內不能說：『某事是僅關我個人的，或惡化了，或腐化了，是我個人的惡與腐，與黨無關』。何況在領導民衆之中，替民衆做工作，爲民衆做工作，舉凡民衆的事，就通通要由我們負責；以黨治國，國家整個的責任就在黨。理論既屬如此，實際工作上如何能有所表見？放棄，推諉，躲閃，規避，抵賴種

種，豈是革命的工作，又豈是工作的革命呢？兄弟從前隨 總理北伐，大本營在桂林和韶關，每天總是五時起身，六時辦事，直到晚上能睡覺時爲止。對於許多同志，到時不來，不到時便去，很覺奇怪。而他們見兄弟那樣，也覺得『大家都走了，你獨不走，總是你囉唆，討厭』。那時簡直事無大小，務必躬親。惟恐一件事來，主持者看他不起，派下去，下面也看他不起，再派下去，甚至派給桌子櫃子，攔起來爲止了。那時大本營文官處秘書處一共有十三個人，因爲 總理親自率軍北伐，軍隊有好幾軍人，文件以外，軍械，軍餉，軍需等等，都是文官處辦理。真到那忙不開時，每每自己怨自己，爲何不多立機關，多帶人員，分頭辦理呢？過後想想，那時經費不充，肯隨軍冒險的人不多，只好由少數人勉力擔負了。但是同時也有一種好處，各方面既經自己都留了意，人無蒙蔽，事無壓積，到晚上睡覺時，很爲放心，覺得這一天沒有遺憾。現在大家做革命工作，這樣的機會不常遇，或者也用不到這樣辛苦，但是身爲何人，所幹何事，理論上的責任如何重大，既然一日未變，工作上的責任，究竟符合了理論與否，就一日不可忽略，必須自己嚴格的檢查自己，那才成爲責任化的革命工

作呢。

最後兄弟還有一個意見，就是大家在革命工作中，一面千萬不可不虛心，而一面有甚麼意見，千萬不可深自秘惜。用心研究，和交換意見兩層，最爲要緊。工作既靠理論爲南針，自己的理論若明知不夠，就得細心看書，或虛心問人；不能以工作匆忙，無暇他顧自解，便高擱起書本來不看。古人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難道我們也說『一行辦黨，此事遂廢』嗎？自己有所覺悟，有所警惕，覺得凡屬同志都該曉得的，那就得常常對同志宣示，不要一得自秘，也不必怕人嫌囉唆。如果自己的意見還不對，不完美，一經人家批評討論，有所糾正補充，豈非彼此都得益處嗎？尤其是在黨部工作的同志，自己有話沒有機會對人講，人有話又沒有機會來問難，大家各執一是，永不對面，於是攪得內部意見不一，而對外大鬧笑話了。許多同志隨便對外發表意見的，向壞裏說，或是愛出風頭，或是別有作用；向好裏想，他們也許是爲良心所驅使，覺得如此是正誼，不得不仗義立言。對外發表，誠然在黨的紀律下總無容許的餘地，至於對內多多與人研究討論。正是應該的，需要的。所謂黨員的言

論自由權，正應該應用在同志間的研究討論上。如今不當用的反而用了，當用的反而不用，我們工作上如果凡事，都是如此顛顛倒倒的，那還得了嗎！所以兄弟今天講這個題目，『革命理論與革命工作』，可以仍用兩句話來作結束，就是在革命工作中要常常研究理論，在革命理論中要處處以工作為基礎。

革命與求學 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大學演講

革命與求學是一件事。——數年前我國青年的謬見。——本黨所望於青年的如何。——第三國際所以殘害我國青年的如何。——『離開革命，就沒有學問』。

——『革命的基礎，是在高深的學問』。——三民主義乃世界上一切學問的集體。——今後青年認真求學才是認真革命。

各位同志，各位同學：剛才主席介紹兄弟，說兄弟的學問如何優長，辦黨如何努力，可以作青年的模範，兄弟實在不敢當，因為兄弟自己想想，有許多地方，正以不能如此做到為恨。兄弟做了中央常務委員，而每天並沒有多少時間為黨努力；至於學問，更是太荒疎了，雖然二三十年來，刻刻不忘讀書，但常為事務所耽誤，也就無甚成績：對於『模範』兩個字，真覺得慚愧得很！

二十年來青年同志們常遇到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就是『應該讀書呢？還是應該辦事？』同時又有一個連帶的問題，『如果要讀書，讀書的目的究竟是甚麼？』這兩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是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研究的。二十七八年前，兄弟到日本去念書，年紀大概與各位現在相仿，不過環境可是與各位現在的不同。大家都知道那時是滿清專制的當兒，政治攪得很糟，所以明白一點的青年，腦筋裏都生出一個革命的觀念來，如兄弟就是一個。不過當時這種觀念很模糊，因為並沒有領會到 總理的三民主義，也全然不知道革命的方略。後來在日本先學了師範，再學了法政，同時又入了 總理所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對於革命的主義方略等，才有了認識。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上面所說的那一個問題了，『應該讀書呢？還是應該辦事？』這個問題難解決得很，因為要求學就不能辦事，要辦事就不能求學，二者不可得兼，孰取孰捨，煞費躊躇。當時看見有些人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的，讀書的便專心去讀書，辦事的便專心去辦事，意志專一，生活安定，頗加羨慕；同時又見那沒有解決的人，辦事時候分心想讀書，讀書時候又分心想辦事，心神無主，不知如何是可，有時更弄得左支右

細，費了力氣，而兩面都不討好，又深以為戒。無奈看來看去，越知道自己這個問題非趕緊解決不可，而越不知道自己這個問題究竟如何解決才好。後來畢竟因為對於革命的信仰日堅，無論如何是要常常為革命而工作的，不過在革命的工作之中，深深感到自己學問的欠缺，便又不能不隨時為工作而求學罷了。於是這個問題，就此解決了：以後一定要為民衆而努力革命，同時又一定要為革命而努力求學；總之，宗旨只有一個，革命而已，而辦法上却一定要使革命的工作更有力，革命的結果更有收穫。當時在如此解決之中，並且悟到兩層道理：第一，辦事與求學，實在是一件事，並不是兩件事。譬如軍人應辦的事是作戰衛國，而應求的學也就是軍事上種種的知識，技能，軍人的操練是作戰的準備，所以操練與作戰是前後相聯貫的一件事，是平時與臨時相應合的一件事；同樣我們的求學，就是去革命的準備，所以求學與革命也是前後相聯貫的一件事，也是平時與臨時相應合的一件事。第二，我們所辦的事，如果是一國的政治，不消說和全國有極大的關係了，就是辦一家的事，一身的事，也無不與社會有密切關係，他的影響，會從小節變成大事，會從現在延到將來，我們斷不能因

爲他發端很微細而加以忽略。所以我們無論辦甚麼事，總要鄭重，不能隨隨便便，不能不求效能的增進，和成績的良好，那也就不得不努力讀書，以求本身力量的充實。當時既然覺悟到種種，心也定了，無論對於革命或求學，都得着進一步的了解，也就加一倍的努力了。不過當時的環境，還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後來所沒有的，就是滿清政治的腐敗，和社會心理的浮動，已到了極點，革命的進行，已迫不及待，實在不容許我們從從容容的求學了。加以另有一班自命維新的人物，又高張起保皇立憲的旗幟來，做那不徹底的改良運動，實在是阻礙革命的進行。所以那時只感覺到政象日非，國事日急，眼看着種滅國亡，就在旦夕，而一般人民又昏昏糊糊的，把國家的事情，看得和自己一毫無關，教我們那班要革命的青年，雖然自知操練還沒有純熟，學問還沒有成就，怎麼還耐得住，而不立刻去拚命呢！但是我們深知自己學問的不夠，將來辦事上是要吃虧的，所以在百忙之中，一有功夫，終於很努力的讀書。大家凡是真正同志的，都只有這樣一個辦法，也就可以想見當時各方面情形的急迫和艱窘了。

數年前全國一般的青年曾經着了迷，以為在那個時期，青年們應該革命，而不應該求學。所以當時有一個口號說：『求學是不革命的！』有人竟說：『求學便是反革命！』這樣兩個口號一提出，一般以革命自任的青年，都認為天經地義，再也不要讀書，不要學問，以為頂多看幾本關於革命的小冊子就夠了。這種情形，最初是發生於廣東，後來不多時便傳佈全國，大家對於讀書都深惡痛絕，視為革命的障礙，錯誤可算到了極點！考查這種錯誤的原因，根本是由於誤解革命的意義，不知道革命是一種重大而且切實的工作，只當鹵莽滅裂的做去，也就可勝任愉快的。近來青年中這種錯誤已經減少，已經覺悟到應該求學了，但是我們相信少數的青年，對於求學一事，至今還有在那裏懷疑的，以為『革命尚未成功，我們就能把革命的工作，統統放下來了麼？我們從前的呼號奔走，是適應的時代的要求，難道現在已經無可呼號，不須奔走，我們便能專門埋頭用功，凡事不管了麼？』這種疑慮，誠然也有相當的理由，不過我們要曉得：目前既已到了以黨治國的時候，本黨 總理所定的建國方略是如何，其中需要於青年的如何，本黨為求實現 總理這種方略，所期望於全國青年的又如何，

所要訓練全國青年的又如何，青年一定要首先弄清楚，然後對於革命與求學間的問題，才會得着適當的解決呢。本黨所期望於全國青年的，實至深且遠，只要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的宣言，和最近的國民政府宣言，就可完全明白了。青年是國家的至寶，民族的生命，我們要求生機的蓬勃，生命的久長，惟有使現代的青年，在身體上，精神上，有充分的發育，以備切實擔負今後鉅大而且艱難的工作。因此政府承黨的意旨，確定今後教育建設的政策，凡是智識未充，判斷力未備，身體發育未臻健全，擔荷力有限的，都不許參加政治鬥爭和社會鬥爭。今後的青年非一反往日錯誤的思想與行動，斷不足以挽回垂亡的國運，完成實現三民主義的大業。於此我們就可知道本黨的期望青年，是如何深遠，如何重大了。

在這裏我們不得不接着說一說的，就是本黨所期望於青年的固是如此，而目前惡化勢力仍然繼續不斷來誘陷青年的又是怎樣，不妨將兩下比較比較。俄國共產黨中有CY與CP兩種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們對於CY，不准擔負實際的工作，祇加以嚴格的訓練，以充實其本身的力量，直到能做CP的時候，才得去從事社會的鬥爭。所以俄國共產黨的CY，

真不過是C P的養成所而已。但是第三國際所以指揮中國共產黨的，可就大大的不然了：他們要中國共產黨中的C Y去監督C P，做那搗亂中國格外亂得厲害的勾當。陳獨秀不明白他們這種政策的用意，所以在民國十五年C Y開大會時說：『現在的情形不對了，怎麼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起C P的全權來，而C P反要受他們的監督呢？』他不明白第三國際在中國的辦法，是正要與在俄國的相反，在俄國或者要他們革命，在中國只要他們搗亂，絕不要他們革命。既是這樣一個宗旨，他們還替中國青年養成充足的能力，去擔負甚麼重大的工作嗎？去年兩湖攪得極糟的時候，十六七歲的青年通通占了地方上重要的職位，參加他們所謂階級的鬥爭。誰都知道十六七歲的青年，無論天才如何優越，學識經驗的欠缺，總是無可諱言的，結果還不是犧牲了地方，犧牲了青年，短促了我國的生機與生命嗎？第三國際搗亂中國，殘害青年的計劃，是如此的惡毒，而本黨所以為國為青年的打算，又是如彼の忠誠，青年不可以不細心體察啊！

兄弟現在再把求學是為革命，革命定要求學的意思，切實說個明白。總理從前曾經在

廣東中山大學演講三民主義，那時該大學尙稱爲廣州大學，有人問過 總理：『我們今後應該學些甚麼？』 總理說：『離開革命，就沒有學問。』後來 總理到黃埔軍校去演講又說：『革命的基礎，是在高深的學問。』我們想： 總理這兩句話是一貫的，意思何等的深遠！他就是說：革命必須用學問，而求學必須爲革命。 總理洞達革命的眞義，創造了三民主義，作我們革命的根據。凡是 總理的信徒，革命的同志，都該知道：革命是爲建設的，其中爲了建設，才不得已而有破壞；沒有建設的破壞，也算不上是革命。革命是徹底的，整個的，而不是妥協的，部分的，所以並不是改良；建設也是根本的，永久的，而不是枝節的，暫時的，所以也不是改頭換面，或相安一時。凡不以建設爲目的的破壞，或只以民生問題爲煽惑，而沒有民族民權的計劃的，僅不過是張獻忠李自成的殺人放火而已，算不得是革命！凡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或只有民族的號召，而沒有民權民生的計劃的，僅不過是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天國而已，也算不得是革命！凡只求相安一時，隨便妥協，只有一點民權的要求，而沒有民族民生的計劃的，僅不過是康有爲梁啓超的君主立憲而已，更算不得是革命！因爲

專門殺人放火，或僅僅推翻異族的政權便算了事的，固然沒有建設可言，就是改頭換面，相安一時的改良政策之中，又那裏有多大的建設在着！所以這些都算不得是革命，而能夠算得是完備的真實的革命的，惟有一個建設的三民主義的革命而已。建設非學問不可，這一層大家都無疑義吧？而離開了建設，或減少了建設，既然便都不是革命，那麼革命當然也非學問不可了；如果離開了學問，或減少了學問，當然也就無從完成革命的全功了。三民主義何以會是『建設的』呢？何以三民主義就足以做我們革命的根據的呢？原來因為世界一切的學問，實在都不出三民主義的範圍，而三民主義乃是世界上一切學問的集體。這句話並非武斷，我們只要看凡關於政治經濟及一切文化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哲學文學等等，那一樣不系屬在民族民權民生三種分別的作用，及三種連環的作用之下？要完全實現 總理的三民主義；又那一樣學問用不着？我們可以堅決的說：除了 總理的三民主義所範圍的以外，世界上再沒有甚麼學問了；革命的青年也祇要在三民主義之中找定一種學問去研究，此外的可以不必去找，也可以不必去學了。所以 總理又曾很懇切的說過：『祇要學革命』，我們知道 總

理這句話並不是空話大話，我們只要看 總理的實業計畫，不是專為建設，專為革命而定的。一部分革命計畫嗎？假如單把這部分計畫完全實現起來，究竟要多少學問？要多少人才呢？這些學問與人才，我們現在難道已充分的準備好了嗎？除開青年，難道我們還有甚麼別的人可以負託他去準備嗎？前幾個月兄弟離開倫敦時，倫敦的同志們開會歡送，有許多學生問兄弟：『我們以後應該學甚麼呢？將來回國以後，又當怎樣呢？』他們問這些話，心裏是有着恐懼的，恐懼回國以後，仍舊要遇到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景況。當時兄弟就告訴他們說：『今後國內的情形，與諸君現在所慮的，一定適得其反。假如我們按照 總理的計畫去實行，恐怕把在歐洲最好的學生招得來還不夠呢！在各樣事情都落後的中國，不論那一種的人才，都十二分的需要。如果真有了學問，在革命的黨治之下，絕不怕將來沒有地方須用，只怕自己的學問並沒有切實的把握罷了』。他們對於兄弟的這一番話，很以為然。由此看來，今後全國青年最要緊的是先認識本國的國情，先認識何謂革命，何謂三民主義，本黨今後是如何的期望青年，訓練青年，凡此種種先明白了，然後再去決定革命與求學間的一切問題。

。假如說依那惡化的危言聳聽，我們便丟開求學專去革命吧，那麼今後走遍天下，已找不着
一樁離開學問而能革命的事；假如怕專門求學，久而久之或將流爲不革命吧，那麼我們已經
認清，求學與革命是一件事，只要你在三民主義範圍以內找學問去求，是絕不會不革命反革
命的；假如想一面求學，一面革命吧，那麼今後國家的統一已日漸鞏固，訓政已經開始，建
設已在進行，一切政治社會的情況，已漸漸上了三民主義的軌道，雖然國家的環境，依然險
惡，國民不能有一刻的懈怠，但究竟和三十年前兄弟等留學日本時的情形不同，青年可以無
所用其遲疑惶惑，徘徊不定了。然則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惟一解決方法是甚麼呢？兄弟敢正告
一班真正想革命的青年：爲達真正革命的目的，爲負真正革命的責任，爲保持以往破壞革命
的成績，和啓發未來建設革命的大業，而完成革命整個的全功，諸位一定不能蹉跎了自己求
學的時期，惟有向三民主義範圍以內趕緊認定了一種專門學問，專心一致的去研究。假如不
這樣解決，而走入了別的歧路，那結果一定要糟的；也不必說弄得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等等
的地步，至少延緩三民主義的實現，耽擱革命全功的告成，這一種責任，這一個罪名，青年

總無從避免吧？既是真想革命的青年，又怎能甘心來担這種責任與這種罪名呢！

以上所說，不過表明兩層：革命需要學問，和真正革命的青年，今後惟有認真求學；至於另一方面的意思，凡是青年的求學，一定要為革命，而不是為私人的生活，和一家的幸福，換句話說，就是求學而不革命，都是要不得的。這裏試將總理一生革命與求學的情形，再來借鏡一番，以證實上面所述的種種吧。總理生平所處的時代背景如何，大家都明白的，而總理辦事的時間，與讀書的時間，多寡可算相當；總理畢生的精力，也可算是革命與求學，兩件事情各占其半。所以誰都承認總理是最革命的人，而同時誰也應該承認總理是最好學的人。他生平革命的精神，是一切革命者的模範，而他的淵博的學問，也是一般學問家所敬佩的。我們可以說：總理所以能成就革命上這樣偉大的功績的，完全是由於他學問基礎的高深。假如我們用極滑稽的口吻說：總理在努力三月二十九等等的運動是革命，在努力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等的著作便不是革命，世上會有人相信嗎？

總之：今後的青年，第一不能認錯了準備革命就不是革命。我們對於前方作戰的朋友，

固然認他是軍人，就是對於後方操練的朋友，也不能不認他是軍人。如果說戰場上的才是軍人，操場上的便不是軍人，那不是笑話嗎？如果不先上操場，怎麼能上戰場？操場上所做的，如果不完全爲的是上戰場，那又怎麼行呢？第二要明白 總理所昭示我們的是『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總理所遺留下來的這種尙未成功的革命工作，豈是一人兩人，十朝半月所能完成的！我們已往和現在所做到的，祇像是一部書的第一冊第一頁第一行前幾個字罷了，後面沒有做的多着呢！我們總得設法，怎樣才能把中國與世界，從牠們舊有的地位推進到我們理想中的自由平等，博愛大同的境域去？我們要做到這一步，應當具有何等的大智慧，大學問，大力量才行？這都是我們青年學者所當研究，我們青年同志所當担任的。青年們！今後大家惟一的口號與行爲，都應該是『只有認真求學，才是認真革命』啊！大家並且永遠莫忘記 總理的這兩句話：『離開革命，就沒有學問』，『革命的基礎，是在高深的學問』。

孫中山先生十講

定價二角

本書彙集孫中山先生年來十次大演講而編成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設計畫，救國政策，闡發詳盡。現在革命思潮，磅礴大地，國民手此一編，宛如在講壇下親聆革命領袖發揮議論也。

十講 之 軍人精神教育

定價一角

中山學院叢刊第一種

孫文主義總論

邵元冲講演

此書以簡明的講演，述說孫文主義之產生，時代的背景，與各派社會主義的比較，其內容，及對于中國和世界前途之關係。共分四講，對于孫文主義，下公正平允的論斷。定價一角二分

日 本 論

戴季陶著

定價一元
精裝七角
平裝七角

是書爲戴先生最近之傑作，全書凡二十四章。完全用客觀的態度，解剖日本思想行爲的歷史背景與其現勢。胡展堂先生序文中言：「此書之批評日本人，比日本人之批評日本人，還要來得確實。」可見其價值之一斑。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日本對華最近野心之暴露

新滿蒙政策

周佩嵐著

定價三角

本書爲日本野心家最近對於滿蒙問題之親筆供狀。其用心之深險，設計之周密，持論之奸詐，躍然紙上。至其剖析滿蒙內部現勢之處，多爲國人之所不及知，尤足令人動心駭目而不能自己。讀此書而不憤慨怵惕者，吾敢斷其必非中國人。書凡十章，計十萬言。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胡漢民先生演講集第四集

(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演講者 胡 漢 民

發行者 民 智 書 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至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 智 書 局

漢口 湖北省 漢陽 漢陽里十一號
武昌 省政府 前
杭州 永 安 坊
廣州 永 安 坊

發 (一四一三)

573

1902/1

